

阿尔泰语言中分类词的起源与分布*

陈甚安¹ 唐威洋² 梁永平¹ 何万顺^{3,1}

¹国立政治大学, 台北

²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巴黎

³东海大学, 台中


摘要

分类词（个体量词）常见于东亚与东南亚语言，但在北亚至东欧地区的阿尔泰语言中常被忽视。本文检视 65 个阿尔泰语言，发现有 15 个是分类词语言，但其分类词多半不发达且是选择性使用，因而推测其分类词并非原生系统。依据「分类词单一起源假设」：欧亚地区仅汉语之分类词为原生系统，本文推测阿尔泰语言中的分类词是与邻近的汉语或波斯语接触产生的。本文首先确认这 15 个语言的分类词符合严谨的定义，接着检视各语言中分类词的语意与语音，判断是否具有汉语或波斯语分类词的特征。最后综合各语言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归纳出以维吾尔语为界，以东之阿尔泰分类词语言受汉语影响，以西则受波斯语影响，维吾尔语则同时受两者影响。假设波斯语的分类词亦间接受汉语影响，则汉语为欧亚语言分类词单一起源的假设亦适用于阿尔泰语言。

关键词

分类词 量词 阿尔泰语言 语言接触 分类词单一起源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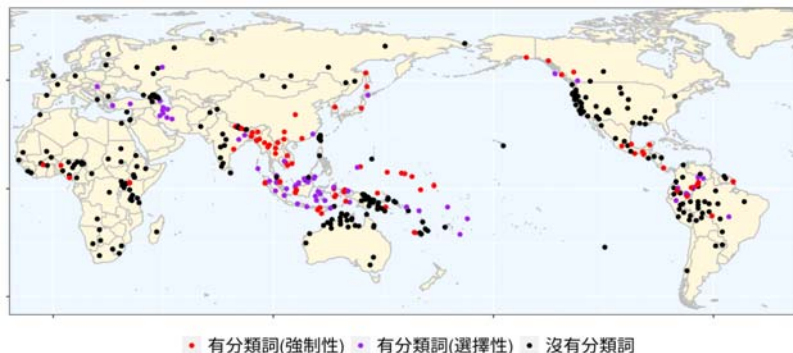
*致谢 本文以第一作者之硕士论文为基础改写精进而成。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在数轮的审查中提供了诸多甚具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作者深表敬意与谢意。本文之研究获得以下两项台湾科技部研究计划之支持：108-2410-H-029-062-MY3、106-2410-H-029-077-MY3，作者在此一并致谢。

何萬順 (One-Soon Her; 通讯作者) [onesoon@gmail.com]; 东海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台中, 台湾 407224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407224);  <http://orcid.org/0000-0002-8255-8061>

1. 绪论

分类词在东亚及东南亚语言中是非常普遍的词类，在句法结构中 与数词及名词连用，且在语意上须与名词有关连。汉语是极为典型的 分类词语言，有非常丰富的分类词系统；如分类词「朵」就必须接 花类的名词，而「顶」则必须和帽子类的名词并用，因此可以是「三 朵玫瑰」、「三项钢盔」，但不会是「三朵钢盔」或「三项玫瑰」。 分类词在文献中有许多名称，如类别词、单位词或个体量词等等，本 文一律以「分类词」称之。

对于分类词语言在全世界的分布，Gil (2013)调查了 400 种语言， 其中 140 种语言有分类词。图 1 中标记黑点的语言不含分类词；紫点 的语言有分类词，但并非强制使用；红点的语言则具有强制性的分类 词。亚洲地区语言的分类词系统最丰富，且大部分具有强制性，而美 洲与非洲沿海只存在少数的分类词语言，澳洲则没有。



● 有分類詞(強制性) ● 有分類詞(選擇性) ● 沒有分類詞

图 1 世界分类词语言分布 (Gil 2013)

除了 Gil (2013) 的研究之外，Her and Li (to appear)依照语言的 分布密度和地理关系，将分类词语言分布最密集的汉语族(Sinitic)、苗 瑶语系 (Miao-Yao)、南亚语系(Austroasiatic)、壮侗语系(Tai-Kadai)、 藏缅语族(Tibeto-Burman)、印度-雅利安语支(Indo-Aryan) 汇整并做出 「分类词单一起源假设」(Single Origin Hypothesis)。该文透过语言及 地理分析，推断这六支语系的分类词皆来自单一语言，透过接触邻近 语言向外扩散，使其他语言也产生分类词。过往的学者因分类词语言 在壮侗语系以及汉语族最为密集且丰富，而分为主张起源为「汉语」 和「壮侗语系」两派。Her and Li (to appear)认为关键线索是早在公元 前 16 世纪，商朝甲骨文中就已记载少量的分类词；到了公元 220 年的

魏晋南北朝，分类词的功能已非常广泛且分工精细(Bu 2011)。相较于汉语，壮侗语系最早出现的文字是在公元 1300 年，甚至比分类词已发展成熟的魏晋南北朝晚了一千年，这是「分类词汉语起源」的一大优势。Her and Li (to appear)进而提出分类词之「单一起源假设」，主张欧亚地区语言中分类词之产生均直接或间接受汉语影响¹。

除上述语言区域外，也有其他语言受汉语影响而产生分类词。日语及韩语的分类词皆是受汉语影响而来。日语方面，可透过例句 *usi san-tou*「牛三头」发现日语受汉语的影响，除借用汉语词汇「头」为分类词外，日语数词系统从「三」开始就借用汉语数词系统计算数量，原生数词残存至「二」以下，其余已极少用。韩语则只借用汉语分类词的概念，仍使用韩语固有词作分类词。但无论是借用概念或词汇，皆可看出日语和韩语与汉语接触后留下的痕迹(Janhunen 2000)。根据韩语和日语的例子可知，地理环境靠近汉语区域，或历史文化上曾与汉语交流密切的语言，很有可能产生分类词。

另外较不受重视的是，从中国东北到东欧的阿尔泰语言²中，也存在少数的分类词语言，但其分类词数量远不如汉语，且大多是选择性使用(Chen 2015)。这些现象显示阿尔泰语言的分类词应非原生系统，而是受到其他语言影响才产生。本文的主旨是从既有文献发掘阿尔泰语言中的分类词语言，其地理环境及语料特性，并推测其分类词可能的来源。

本文架构如下：在第二节首先定义分类词；第三节介绍 14 种阿尔泰分类词语言之地理分布，并依地理位置初步推测其分类词之可能来源；第四节将分类词依其起源分类，并验证是否符合第三节的语言地理分布，同时验证单一起源理论的正确性；第五节为本文结论。

2. 定义分类词

本研究的主旨是推测阿尔泰语言分类词的来源，故如何定义分类词至关重要。过往许多研究对分类词未有一致的定义，又因分类词与量词在句法结构上占相同位置而将两者归为一类，许多文献用「量词」统一称呼两者。Greenberg ([1972] 1990, 172)从数学的角度对分类词的定义做出相当精简的解释：分类词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乘 1」。在此基础上，Her (2012) 将分类词(Classifier)和量词(Measure word)视为乘法算式中的被乘数，数词为乘数。举例来说，「三条鱼」、「三只鱼」与「三尾鱼」乘法上皆是「[3×1] 鱼」的概念，翻译成英文皆是“three fish”，即使删除分类词「条」、「只」和「尾」的「乘 1」也不会数量上有任何改变，这也说明为何分类词在语意上是可省略的。

然而，在「三斤鱼」、「三箱鱼」和「三堆鱼」中，量词「斤」、「箱」和「堆」在数学上的值都不是 1，但也同样是乘数「三」的被乘数。藉由乘法概念可以清楚得知，分类词与量词同为被乘数，在句法为同一词类，但在语意上形成两个次类，分类词的值必然是 1，而量词的值则不必然为 1。

以撒拉语为例，林连云(Lin 1985)将句(1)中的“bun”(本)和“goş”(双)皆统称为「量词」；但以上述的乘法定义判断，“bun”为「乘 1」，是分类词；“goş”为「乘 2」，是量词。因此，(1a)中的“bun”出现与否并不影响语意，但若将(1b)中的“goş”删除，则无法得到「双」的数学意义。

(1) 撒拉语(Lin 1985, 54)

- | | |
|---------------|----------------|
| a. bər bun şu | b. bər goş goz |
| 一 本 书 | 一 双 眼睛 |
| ‘一本书’ | ‘一双眼睛’ |

因此，将“bun”和“goş”视为同一词类是正确的，但藉由乘法定义可进而判断出仅有“bun”为分类词。本文将依此标准判断阿尔泰语言中的分类词。

3. 阿尔泰分类词语言之分布

虽然「阿尔泰」应视为「语系」或「语区」尚有争议，但并不影响本文论述。本文采用 *Ethnologue* 所纪录的 65 种阿尔泰语言，其中有 41 种突厥语(Turkic languages)、13 种蒙古语(Mongolic languages)和 11 种满-通古斯语(Manchu-Tungus languages)；由于日语及韩语是否属阿尔泰语言尚有争议，且如前所述，两者的分类词都已确定是从汉语借用词汇或概念产生，并无讨论需要，因此并无纳入本文讨论范围。如图 2 所示，阿尔泰语区涵盖北亚、中亚和东欧等地区。本文从文献整理所发现的分类词语言有 15 个，详见附录。其中突厥语有 9 个：鞑靼语(Tatar)、土耳其语(Turkish)、克里米亚鞑靼语(Crimean Tatar)、阿塞拜疆语(Azerbaijani)³、撒拉语(Salar)、西部裕固语(West Yugur)、维吾尔语(Uyghur)、哈萨克语(Kazakh)及乌兹别克语(Uzbek)；蒙古语中有 3 个：达斡尔语(Daur)、土族语(Monguor)和东乡语(Santa)；满-通古斯语有 3 个：满语(Manchu)、鄂温克语(Evenki)及锡伯语(Xibe)。



图2 阿尔泰语言分布图

除具有复杂分类词系统的汉语，现今伊朗使用的现代波斯语（亦称伊朗语）中也存在许多分类词(Mahootian 1997)。相较于汉语，波斯语的分类词数量虽不丰富，但已是目前该区域能找到分类词系统最丰富的语言。截至目前为止，除伊朗本土的波斯语外，周边地区尚未发现比波斯语还要发达的分类词语言。又因波斯语地理位置离汉语使用区域较远，大致排除语言接触的可能；关于波斯语分类词的来源，仅知部分是从阿拉伯语的名词借用而来(Stilo 2018)，尚未有非常明确的源头。本文从地缘因素猜测波斯语为另一个阿尔泰语言的分类词来源。本节主要以 15 个分类词语言的地理位置，辅以语言接触的历史数据，推测这些语言的分类词来源。

3.1 突厥语族中分类词语言之分布

以下介绍突厥语族中 9 个分类词语言的地理位置：鞑靼语(Tatar)、土耳其语(Turkish)、克里米亚鞑靼语(Crimean Tatar)、阿塞拜疆语(Azerbaijani)、撒拉语(Salar)、西部裕固语(West Yugur)、维吾尔语(Uyghur)、哈萨克语(Kazakh)及乌兹别克语(Uzbek)。

鞑靼语又称塔塔尔语，为鞑靼人的主要语言。近代鞑靼人大部分居住在东欧及俄罗斯，只有约五千人在 20 世纪中叶迁至中国境内，仅占鞑靼人口的 1% (Schwarz 1984)。因年代尚近，中国的鞑靼语与东欧的鞑靼语并无太大差异。按地理位置判断，鞑靼语和汉语地区距离遥远，故将其分类词可能来源归于波斯语。从历史角度来看，鞑靼的历史最早记载于唐朝，属于突厥统治下的部落；但蒙古西征时，「鞑靼」被欧洲人与中亚人用来称呼蒙古人(Chen 1986)。现代鞑靼人之先祖为属突厥民族，居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布加尔人(Volga

Bulghars)。9 至 11 世纪，伊斯兰化的波斯文化透过贸易往中亚传递，影响当时为游牧民族的突厥人，使布加人于 10 至 11 世纪皈依伊斯兰教(Csató and Johanson 2015)；这个过程很可能将波斯语分类词带入这些民族的语言中。13 世纪蒙古人消灭布加部落联盟，建立钦察汗国，当地人便接受统治者的「鞑靼」称号作为本民族的名称(Chen 1986)。15 世纪中叶，钦察汗国逐渐瓦解，鞑靼人建立了喀山汗国(Khanate of Kazan)；古鞑靼语(Old Tatar)于此时形成，并在 16 世纪俄国并吞喀山汗国后成为官方与俄国境内外突厥人沟通的语言(Chen 1986; Burbiel 2018)。古鞑靼语于 19 世纪的中亚影响力甚大，鞑靼人透过该语言向中亚传播伊斯兰教，同时也藉该语言与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和克里米亚鞑靼人交流(Csató and Johanson 2015)。从古鞑靼语的书面语数据来看，该语言保留了浓厚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色彩(Burbiel 2018)，可能对哈萨克语、土耳其语、克里米亚鞑靼语产生了不小影响，包括巩固分类词的使用。随着历史演进，古鞑靼语与周边蒙古语及其他民族的语言接触后，逐渐演变成今日的鞑靼语(Chen 1986)。这些历史资料也能支持鞑靼语分类词来自波斯语的假设。

土耳其语起源于中亚，是突厥语族中最多人使用的语言，现今约 8000 万人使用，通行于土耳其及其周边国家。现代土耳其民族的形成源于塞尔柱帝国(Seljuk Empire)，该政权的主体民族是前述于 9 至 11 世纪接受波斯-伊斯兰文化的中亚突厥人，他们在公元 1071 年击败拜占庭帝国后占领了现今土耳其的领土主体——小亚细亚半岛(Csató and Johanson 2015)，让中亚突厥部落及其波斯化的语言文化得以进入该地区。土耳其语最早的文字出现于公元 1200 年，地理位置与波斯语地区极为接近，且语言中有许多从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借用的词汇，很可能从塞尔柱帝国时期便存在，因此可合理推测土耳其语的分类词是受波斯语影响。又因相对于其他接近欧洲的阿尔泰语言，更接近波斯语区，因此相较于更北方的其他突厥语言，土耳其语产生分类词的可能性较高。

克里米亚鞑靼语位于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因名称相似，克里米亚鞑靼语常被误会是鞑靼语的方言，但其所属之钦察语支与鞑靼语所属之西突厥语支为不同分支(Mansur 2018)，不能互相沟通。克里米亚鞑靼语为阿尔泰语言分布最西北方的语言，与汉语区距离太远，其分类词相当可能是受波斯语的影响。且在钦察汗国瓦解，克里米亚汗国独立后不久便成为鄂图曼土耳其的附庸国(Csató and Johanson 2015)，又在 18 世纪被俄罗斯并吞(Liu 2014)，因此克里米亚鞑靼语应受到土

土耳其语的前身——鄂图曼土耳其语和古鞑靼语的影响，更加提高其分类词间接来自波斯语的可能性。

阿塞拜疆语普遍使用于阿塞拜疆和伊朗，位于欧亚交界，邻近伊朗、哈萨克、土耳其等国。历史上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渊源极深，曾借用这两种语言的词汇和发音，直到 9 世纪才有文字纪录(Cornell 2011)。该语言也深受土耳其语影响，书面阿塞拜疆语和鄂图曼土耳其语密不可分，古土耳其语的文本常可透过古阿塞拜疆语解读；现代阿塞拜疆语以阿塞拜疆首都巴库(Baku)方言为基础，该方言也受现代土耳其语强烈的影响(Csató and Johanson 2015)，因此阿塞拜疆语的语法特征与土耳其语有相似之处(Kornfilt and Heusinger 2009)。地理位置极靠近波斯语区，历史文化也受其影响，因此初步判定为受波斯语影响之分类词语言。

撒拉语为撒拉人的主要语言，分布于中国西北，在今日的青海省以及甘肃省等地。关于撒拉族的族源，主流理论认为其先民于元代从中亚迁至中国(Ma 2008)，因此撒拉语现今还是保有許多突厥语词汇，与土耳其语和维吾尔语等同宗相同(Göksel and Kerslake 2000)。不过相较于其他突厥语言，其地理位置与汉语区十分接近，也和汉藏民族有频繁接触，四周邻近不少分类词语言，如土族语和西部裕固语，因此可判断撒拉语的分类词是从汉语大量借用；也因过度汉化，使现今撒拉语已被中国官方列为濒临消亡的语言(Ma 2009)。综合以上原因，初步将其归类在受汉语影响的分类词语言。

西部裕固语为中国甘肃省等地裕固族使用的语言，使用人数已逐渐减少；相较于同是裕固族常用语言的东部裕固语，虽然地理环境相近，但属于蒙古语族，两者之间无法沟通。裕固族是回鹘人的后裔；建于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于 9 世纪灭亡后(Yang 2015)，其中一支回鹘人南迁至甘肃，和蒙、藏等民族融合形成裕固族(Chen and Lei 1985)。裕固族是本文中唯一一个未经波斯-伊斯兰文化大规模影响的突厥语族群，至今主要宗教信仰仍是佛教与萨满信仰，而非伊斯兰教(Csató and Johanson 2015)；西部裕固语也因此保留了较多古代突厥语的特征，其汉语借词数量远超波斯语与阿拉伯语(Chen and Lei 1985)。从地理和历史角度来看，西部裕固语分类词受汉语影响的可能性较大。

维吾尔语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范围广泛，位于波斯语区和汉语区之间。语言结构与哈萨克语和乌兹别克语相似。维吾尔族和裕固族同样来自回鹘人；回鹘汗国灭亡后，西迁的回鹘人分为三支：迁往中亚者建立了喀喇汗国(Karakhanid Khanate)；迁往新疆吐鲁番盆地者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Idikut)，此为维吾尔族的先祖；迁往甘

肃者则形成裕固族(Yang 2015)。10世纪中叶,喀喇汗国统治者皈依伊斯兰教(Csató and Johanson 2015),并以今日新疆西南部的喀什噶尔(Kashgar)为中心将波斯-伊斯兰文化传入新疆;13至14世纪,维吾尔语的喀什噶尔方言逐渐成为塔里木盆地(新疆南部)的共通语,这样的地位一直持续到19世纪(Engesæth, Yakup, and Dwyer 2009)。由于新疆地区历史上不同政权的递嬗与影响,维吾尔语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曾与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蒙古语借用词汇(Zhao 1985)。虽在历史上常受汉文化影响,但本文初步认为其距离过远,各朝代强盛度也会影响其版图是否涵盖维吾尔语区域,且维吾尔人信奉伊斯兰教,在以地理因素较难判断的情况下,从文化宗教因素初步推测为受波斯语影响之分类词语言。

哈萨克语主要用于哈萨克境内及新疆地区。在历史上与波斯语和汉语皆有接触,但透过14世纪之哈萨克语文献得知,当时已经受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影响而借用词汇;到了18,19世纪,又从属突厥语族的鞑靼和察合台(Chagatai)书面语引进不少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借词;与汉语的接触则较晚,是在近代才借用词汇(Geng and Li 1985)。无论从地缘关系或文化历史影响的顺序来看,皆偏向波斯语区。

乌兹别克语主要用于乌兹别克及中国部分地区,有南北两个分支。其地理位置极靠近伊朗,历史上也与波斯语有深厚关系:乌兹别克人的先祖之一是钦察汗国治下的一个突厥部落联盟——乌兹别克联盟;在钦察汗国瓦解后,其中一部分移至现今乌兹别克地区,征服了当地的突厥部落;这些突厥人的语言与波斯语的塔吉克方言(Tajik)有紧密关系,该语言成为乌兹别克语的主要组成部分(Csató and Johanson 2015)。相对地,乌兹别克语直到近代才与汉语和其他语言接触(Cheng and Abudureheman 1987)。虽然乌兹别克语与汉语和波斯语皆有接触,但无论是从影响的深度、时间顺序或地理位置来看,都能合理推测乌兹别克语是受到波斯语影响之分类词语言。

3.2 蒙古语族中分类词语言之分布

蒙古语族中有三个语言使用分类词:达斡尔语(Daur)、土族语(Monguor)和东乡语(Santa)。达斡尔语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及黑龙江省等地,由达斡尔族使用。达斡尔族是建立辽国之契丹人的后裔,自4世纪中叶起从今日中国东北的辽河辗转移至内蒙古、蒙古国东北部,乃至黑龙江以北等地。17世纪时因俄罗斯势力东移,清朝政府将黑龙江以北的人民迁至南岸,达斡尔族便于现居地生活至今。因地域关系,达斡尔语长期与满语和鄂温克语等满-通古斯语言交流频繁,从这些语

言吸收不少词汇；自清末以来又与汉民族杂居，产生许多汉语借词(Uzhuer 2004)。不论是满语、鄂温克语或汉语皆是分类词语言，因此在地域上达斡尔语可能受汉语直接或间接影响而产生分类词。

土族语使用于青海省土族自治区，与同语族之达斡尔语、保安语、东乡语等有极相似的词汇和句法。土族的前身是从中国东部迁至青海-甘肃一带，使用蒙古语族语言的族群，在藏文文献中已有记载(Chinggeltai 1988)，后来又与元代蒙古移民融合形成(Chinggeltai 1988; Slater 2003)。土族发展历史悠久，土族语与周边的藏语和汉语交流甚密，吸收大量汉语词汇，数词系统也逐渐汉化(Janhunen 2000)。土族人大部分信仰藏传佛教，文化与汉语区域交流相对频繁(Zhaonasitu 1981)，地理位置也相当接近汉语地区，因此归类为受汉语影响之分类词语言。

东乡语是东乡族使用的语言。东乡族信奉伊斯兰教，主要分布于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少部分在 20 世纪后半叶由中国政府迁至甘肃省其他地区与新疆，但仍保持其语言与宗教。东乡族的历史不甚明朗，其口传历史指出他们的祖先在 13 至 14 世纪由中亚迁至现居地；学界主要的推测则是该族是由中亚商人、元朝蒙古士兵与汉人混合形成，这个交流的过程导致这些族群的伊斯兰化及其语言的蒙古化，但具体的发生时间尚待考据(Janhunen 2003)。由于其地理分布接近汉语区，族源也包含汉族，因此将其初步归为受汉语影响之分类词语言。

3.3 满-通古斯语族中分类词语言之分布

满-通古斯语族中有三个语言使用分类词：满语(Manchu)、鄂温克语(Evenki)及锡伯语(Xibe)。满语现存于中国东北，靠近中俄边界，多用于黑龙江省等地(Wang 2005)。满语分类词无论是从地理或文化历史的角度，皆可推测其来源是汉语。在 12 世纪初，满族的祖先，女真部落建立的金朝从东北往南侵略北宋，造成北宋灭亡，随后女真民族与中国北方的汉人接触频繁(Chen 2014)。北宋虽灭亡，但汉文化相对强势，很有可能使女真语大量从汉语借用词汇。现今也可观察到女真文字字型和汉字极为相似。满人身为女真族后裔，满语自然也继承了女真语融合汉语的特色。满人所建立之清朝，更在中国境内统治长约三百年，其语言文化与汉民族已有非常紧密的融合(Liu, Zhao, and Zhao 1997)，故将满语初步归类在受汉语影响之分类词语言。

鄂温克语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及俄罗斯，为鄂温克族主要沟通语言。鄂温克族原本生活在黑龙江中游；17 世纪中叶后，由于俄罗斯势力的扩张，部分鄂温克族人南迁至黑龙江北部的大兴安岭、嫩江一

带；公元 1732 年，清政府将千余名鄂温克族军人及其家属迁至内蒙古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驻防，这是鄂温克族于中国境内的分布西界(Hu 1986)。因语言接触的关系，鄂温克语参杂许多满语、蒙古语、汉语的借词(Atknine 1997)。地理位置在已知阿尔泰分类词语言中位于最北之处，因此可预测其受汉语的影响相较于满语及其他较为南方的语言会更小，分类词也很可能不是来自汉语的直接影响，而是由受汉语影响的满语再间接影响鄂温克语，分类词的数量也因与汉语距离遥远而不丰富。因此，鄂温克语的分类词初步归类在受汉语影响之下。

锡伯语现今分布于两地，主要位于中国东北的辽宁省以及中国西北的新疆(Li and Zhong 1986)。同一语言族群会分隔如此遥远是出于历史原因。锡伯族本居于今日中国吉林省所在地区，在清帝国康熙皇帝时期就被多次以军事目的征调至现在的内蒙古东北部、辽宁省等地(Wu and Zhao 1984)；公元 1764 年，乾隆皇帝又以增防边境为由，调派锡伯族军队前往新疆定居，利于巩固边疆(Han 1994)；因这种历史原因使锡伯人在新疆群聚，造就这种特殊现象。虽然早期分隔两地的锡伯语尚可沟通无碍，随着生活在中国东北的锡伯人与汉民族逐渐融合，锡伯语在东北地区逐渐消亡，反倒在新疆生活的锡伯人保留着旧有的锡伯语。有鉴于锡伯族本出自中国东北，相较于鄂温克族靠近南方，分类词应是直接透过汉语或满语影响而来；且考虑到满清对锡伯族的统治时间较长，控制程度也大于分布范围至俄罗斯的鄂温克族，本文推测是受满语影响而产生分类词。

4. 研究发现之讨论

从语料分析（细节探讨请见「辅助材料」之档案），在 15 种阿尔泰分类词语言中，共有 8 种判定是受汉语影响，有 6 种是受波斯语影响，而维吾尔语则可能受到汉语及波斯语的影响。这些语言的分布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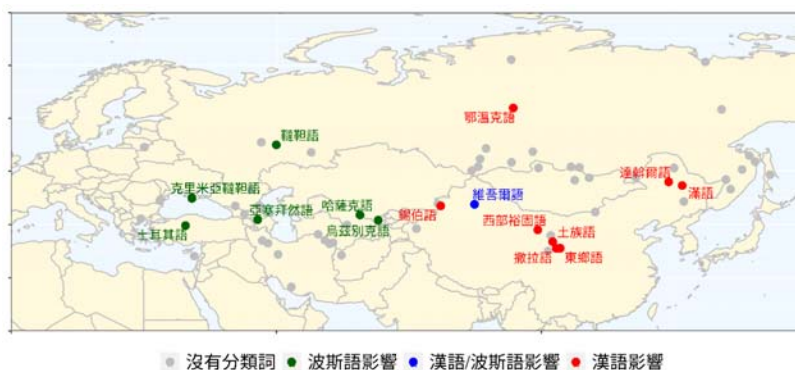


图3 阿尔泰语言中分类词语言分布图

受汉语影响的 8 种分类词语言是：撒拉语、西部裕固语、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满语、鄂温克语和锡伯语。除锡伯语因历史原因迁至远离汉语区的新疆外，其余语言符合第二节地理分布的预测，皆分布在图 3 的右侧。这 8 种语言的分类词多半可从发音寻找来源。相较于受波斯语影响的分类词语言，汉语影响范围涵盖三种不同的语族，其分类词种类相对丰富且差异性大，也借用汉语的排列结构。这和受波斯语影响的语言不同。

在 9 个突厥分类词语言中，只有邻近汉语的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判断是受汉语影响而产生分类词。借用的词汇有概念性也有全面性的例子，涉及自然界的词汇皆使用自身分类词，人工产物的词汇皆使用汉语分类词。其中撒拉语更借用汉语的 [数词+分类词/量词+名词] 排列方式。纵观整个突厥语族，可观察到某些语言的分类词虽是受波斯语影响产生，语言中却充斥汉语量词，显示虽然汉语离这些语言距离相对遥远，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从这点也可看出汉语的强势度大于波斯语。

蒙古语族中土族语、达斡尔语和东乡语皆是受汉语影响的分类词语言。土族语除分类词发音和汉语完全相同外，也借用汉语的数词系统，固有数词逐渐消亡，以及使用汉语 [数词+分类词/量词+名词] 的排列方式。达斡尔语因靠近中国东北，故同时受汉语和满语两大强势语言的影响，使语言中的量词及分类词都比土族语丰富许多，语言当中也存在以叠加分类词表达「每个」的语意，这种在汉语与满语中常出现的分类词应用方式。东乡语绝大多数的分类词都来自汉语，其中有部分是借汉语名词作分类词用，功能相较于接近原名词的汉语分

类词也有所变化，这种对借词的活用显示分类词已深入其语法系统中。总体来说，虽然蒙古语族 14 个语言中仅有 3 个存在分类词，比例略低于其他两个语族，但无论从分类词还是数词系统乃至词汇排列的结构，都可看出汉语对其影响是非常全面的。

而在这 8 种语言当中，分类词发展最为茁壮的是满语，可看出其分类词已逐渐内化，使用固有词替代从汉语借用的分类词，进而产生独有的分类词系统，除了少数量词「丈」「dzaj」「吋」「sun」「斤」「gin」发音与汉语相似，大部分量词及分类词皆已内化，不同于撒拉语或西部裕固语可从分类词的语音观察端倪并找到影响源头，相较之下明显看得出发展深度的差异。

随着满语的分类词系统及民族势力逐渐强大，满语周边与汉语无法直接接触的语言，如锡伯语和鄂温克语，也因满语影响而产生分类词，使两者成为间接受汉语影响的分类词语言。

受波斯语影响的分类词语言有 6 种：鞑靼语、克里米亚鞑靼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皆属突厥语族且皆分布于图 3 左侧，符合第三节地理分布的预测。其中与波斯语分类词最相似且出现频率最高的分类词是“dane”和“næfær”。透过这 6 种语言可知，波斯语的分类词系统虽与汉语一样是主要的影响源头，但波斯语分类词相较于汉语显得薄弱许多，使波斯语周边因其影响而产生的分类词系统都不发达，不如满语强大到可作为一个间接传递的源头。

虽然波斯语与汉语都是分类词的主要源头，但波斯语分类词在使用上是选择性的，因此也应非原生系统；再者，其出现频率极高的分类词“næfær”是从阿拉伯语借用的词汇(Stilo 2018)，但现今阿拉伯语并无分类词，显示波斯语的分类词起源尚有疑问。

在第三节中我们从地理位置判断分类词语言的来源，其中有一个较难判断的语言，即维吾尔语。因其所在位置介于汉语区和波斯语区间，故必须从分类词推敲来源；而我们观察到维吾尔语除了典型的波斯语分类词“næfær”和“dane”外，还有一个用于计算名词「门」的分类词“qanat”，本意为「翅膀」，此分类词在波斯语当中并不存在，反而与汉语的分类词「扇」语意相似。单一语言同时受到两个语言影响而产生分类词的现象虽没有在其他语言出现，也需要更多语料考证，但本文考虑地理分布的独特性，将其视为同时受波斯语和汉语影响的分类词语言⁴。

在第一节提到，某语言对其他语言分类词的借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借用分类词的概念及词汇，属于较彻底的借用，如撒拉语借用汉语的「封」和「本」。另外一种借用方式为概念性的借用，文

献中称为 stimulus diffusion (Kroeber 1940), 是只借用分类词概念并使用自己语言的固有词扮演分类词的角色, 如满语借用汉语分类词「本」的概念, 使用语意为「册」的名词“debtelin” 转变成分类词; 这种概念性的借用必须了解分类词本身的语意和用法才能确认。在藏缅语族的分类词发展中, 概念性的借用也是屡见不鲜(Weidert 1984; Kiryu 2009, 66)。本文中有些语言的少部份分类词无法以语音判断来源, 且文献并无提供其语意, 如撒拉语的分类词“gudu”, 不如“d3oŋ” “fun” 容易判断, 故我们将这类分类词皆视为概念性的借用。

而在突厥语族中, 无论是受汉语还是波斯语影响的分类词语言皆有两个重复度极高的分类词, 即在表 1 和表 2 的两个分类词, 分别为“baʃ”, 其语意是「头」, 用于计算牲畜数量, 和“dyp”, 语意为「根」或「地面」, 用于计算植物, 两者是在古突厥语中就已存在的词汇, 可以理解这些分类词出现频率极高的原因与古代突厥游牧民族的生活息息相关, 皆是与大自然相关的词。不过, 这些语言虽有共同词汇, 但却受到不同的分类词语言影响; 但特别的是, 它们却巧合的使用相同词汇作分类词, 且都具有相同功能。为了解释这种现象, 本文提出两种假设。

表 1 突厥语分类词「头」

阿塞拜疆语	撒拉语	西部裕固语	鞑靼语	哈萨克语
baʃ	baʃ	baʃ	baʃ	bas
克里米亚鞑靼语	土耳其语	乌兹别克语	维吾尔语	
baʃ	baʃ	baʃ	baʃ	

表 2 突厥语分类词「棵」

阿塞拜疆语	撒拉语	西部裕固语	鞑靼语	哈萨克语
	dyp	dəp	typ	typ
克里米亚鞑靼语	土耳其语	乌兹别克语	维吾尔语	
typ		tob	typ	

假设 (一): 波斯语中恰好有和汉语相同概念的词源

Moinfar (1980, 引自 Lehmann 2015) 所整理出来的波斯语分类词当中 (详见「辅助材料」之表 1), 计算动物的分类词“raʔs”, 本身的语意也是「头」, 恰好与汉语的分类词概念相同, 所以有可能是汉语和波斯语都使用相同分类词概念计算动物的情况, 让受影响的语言也使用同一个名词“baʃ”作分类词。然而这种假设似乎不适用于“typ”, 因波斯语中可计算植物的分类词有三个: “ta”、“dane”和“ʕadad”, 其语意皆和“typ”的语意「根」和「地面」无关, 反而是汉语计算植物的

分类词「根」或「棵」和“typ”的语意较贴近，故用第一个假设解释这种现象显得有些差强人意。

假设（二）：古突厥语族中已有分类词

对这种现象的第二种假设是，早在古代突厥民族尚在其起源地，未分散至诸多地区时，就已有分类词的概念。按照 Brunn, Toops, Gilbreath (2012) 所述，突厥人起源于 3, 4 世纪并开始发展成规模强大的部落，在 5 世纪时势力范围已扩及中国和现今乌兹别克等地区，不时会与汉民族产生冲突；6 世纪时版图持续向东扩张，成为中亚地区最强盛的游牧民族，并掌握着丝路；直至 7 世纪，由于唐朝对突厥发动一系列的战争造成突厥民族势力逐渐式微，汉民族重新控制丝路，使突厥民族被迫离开居住地向四周分散，部分突厥民族南迁被汉人同化，其余部落则陆续在往后几百年间西迁至西亚和东欧等地，请见图 4。这是历史上称为「突厥迁徙」的大规模迁移事件。



图 4 突厥西迁路线(Batu and Batu 2018)

因此可以推测，突厥民族在尚未西迁时就与汉民族有频繁的交流。当时已是魏晋南北朝后的年代，据步连增(Bu 2011)所述，魏晋南北朝的分类词已发展成熟，有可能突厥语言的分类词与分类词相对成熟的汉语接触后萌芽，之后部分因战争而迁徙的突厥民族向西扩散时，又因伊斯兰教的强盛而吸收波斯语的分类词，第二度受到分类词影响，造成突厥语言的分类词看似受不同源头影响而产生，却拥有一致分类词的情况。因此古突厥语的分类词很可能是受汉语的影响。

综上所述，似乎有历史事件佐证的第二个假设较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当然这也有待更多文献考证。若此假设成立，就间接证明这 15 个阿尔泰分类词语言皆是受汉语影响，也为 Her and Li (to appear) 提出汉语为源头之「分类词单一起源假设」添加几分证据。

然而波斯语本身的分类词起源似乎较无迹可寻。分类词在波斯语不如汉语有强制性，某些波斯语语法书籍甚至没有提及分类词。Stilo (2018) 和 Lehmann (2015) 针对伊朗的分类词有详细的叙述，但也表明在原始的印欧语系语言中并不存在分类词，其来源似乎没有太多线索可以着墨。在此或可大胆假设：考虑到波斯语东北的西亚地区及西北方的东欧，皆是波斯语分类词传递方向，可以先排除，剩下波斯语以西的阿拉伯半岛和东南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次大陆，较有可能是分类词传入的来源。

Stilo (2018) 虽指出最为常见的分类词“nafar”是从阿拉伯语借用的词汇，似乎从阿拉伯语借用分类词是相当合理的推测；但本文认为从阿拉伯借用的仅是词汇本身，而非分类词的概念。因从 Gil (2013) 的分类词地图可知，阿拉伯语和周边语言都不存在分类词，如要往西南方的非洲延伸的话，必须至中非地区才存在某些分类词语言，故波斯语分类词是由西方的阿拉伯传递而来的猜测似乎过为牵强。在排除阿拉伯半岛为可能的影响源后，仅剩伊朗东南方的印度地区和巴基斯坦可能为波斯语分类词的源头。在 Her and Li (to appear) 的分类词单一起源假设中，印度亚利安语支中共有已知 21 种分类词语言，推测分类词也是受到汉语单一起源影响层层传递而来。这些语言中有部分靠近巴基斯坦南方，相较于阿拉伯语地区，地缘关系较近，故波斯语分类词有较高机会是透过印度亚利安语支的语言传递影响而来。虽然此假设看似符合地理特征，也是波斯语分类词最有可能的来源，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的语言是否存在分类词，仍需更多相关语料考证。

5. 结论

本文探讨阿尔泰语言中分类词的起源与分布。首先耙梳文献探寻看似分类词的现象；为避免名称和定义不同造成混淆，本文依据 Her (2012) 的乘法概念定义真正的分类词，并综合阿尔泰分类词多为选择性的特性，和 Her and Li (to appear) 对于汉语周边语言的分类词皆因语言接触而产生的看法，推测阿尔泰语言中 15 个分类词语言皆是受邻近分类词语言之影响，并将汉语和波斯语这两个邻近且有相对丰富分类词的语言假设为影响的源头。

根据各语言的语料，本文通过比较分类词的发音及概念来推测其来源。初步结果显示，15 种分类词语言皆与其邻近的源头相似，符合地理分布；阿尔泰语言也存在像日语中借用汉语数词系统的情形，且在满-通古斯语族中发现分类词具有二度传递现象，被影响的分类词语言一旦有足够的发展，还会再度传递至周边语言。

本文在突厥语族中发现，无论是受汉语或波斯语影响的分类词语言，皆存在用法及发音相同的分类词“baʃ”和“typ”。加入历史因素进行第二次分析后，推测突厥语族在尚未西迁时，就已经受汉语影响产生分类词，西迁后再从波斯语受到二度影响，使突厥语族的语言中，虽各自有波斯语和汉语分类词的显著特征，但也具有共同分类词。这个结果也与 Her and Li (to appear) 的汉语为欧亚语言分类词单一起源的假设不谋而合。此外，波斯语本身的分类词也应是受其他语言影响而来，依据地理环境初步推测是从其东南方的印度亚利安语支传递而来。然而，本文对阿尔泰语言和波斯语的分类词起源虽做出初步的观察，但因涉及范围广泛，历史和地理等诸多因素都需考虑，故需更多研究以验证假设的真实性。

附录
(APPENDIX)

阿尔泰语言列表（不含日本-琉球语系、韩语语系、艾努语）
分类词语言以**粗体底线**标示

突厥语族 (41)	蒙古语族 (13)	通古斯语族 (11)
North Azerbaijani 阿塞拜疆语	Daur 达斡尔语	Manchu 满语
Crimean Tatar 克里米亚鞑靼语	Tu 土族语	Evenki 鄂温克语
Northern Uzbek 乌兹别克语	Dongxiang 东乡语	Xibe 锡伯语
Salar 撒拉语	Bonan	Even
Tatar 鞑靼语	Kangjia	Nanai
Turkish 土耳其语	East Yugur	Negidal
West Yugur 西部裕固语	China Buriat	Oroch
Uyghur 维吾尔语	Mongolia Buriat	Orok
Kazakh 哈萨克语	Russia Buriat	Udihe
Ainu	Halh Mongolia	Ulch
Balkan Gagauz Turkish	Peripheral Mongolia	Oroqen
Karachay-Balkar	Kalmyk-Oirat	

Bashkort	Mogholi	
Chagatai		
Chulym		
Chuvash		
Dolgan		
Gagauz		
Ili Turki		
Karagas		
Karaim		
Karakalpak		
Kashkay		
Khakas		
Khorasani Turkish		
Krimchak		
Kumyk		
Kyrgyz		
Nogai		
Northern Altai		
Salchuq		
Shor		
South Azerbaijani		
Southern Altai		
Southern Uzbek		
Khalaj		
Turkmen		
Tuvan		
Urum		
Yakut		
Siberian Tatar		

注释
(NOTES)

1. 本文中「语言 A 的分类词起源于语言 B」这类表述是指语言 A 的分类词词类并非原生，而是从语言 B 直接或间接借用而来。该借用

包含三种可能：一是语言 A 将语言 B 的某个分类词完全借去，包含其语音和语意；二是语言 A 只借语言 B 的某个分类词之语意，利用自身表达该语意之固有词作为分类词；三是语言 A 只借用语言 B 的分类词词类之功能，根据自身需求创造语音和语意都与语言 B 的分类词没有对应关系的固有分类词。这三种情况并不互斥，可能同时发生于一个语言的分类词借用上，共同形成该语言的分类词词类。

2. 阿尔泰语系的假说存有争议，但无论将「阿尔泰」视为「语系」(language family)或「语区」(Sprachbund or linguistic area)，对本文论述并无影响。

3. 在台湾所使用的名称是「亚塞拜然」。

4. 一位匿名审稿人提出一个疑问：为何在地理上较接近汉语区的蒙古语族语言，如保安语(Bonan)、康家语(Kangjia)，以及满-通古斯语族的鄂温语(Even)、赫哲语(Nanai)、涅吉达尔语(Negidal)等没有受汉语影响产生分类词，但离汉语区甚远的维吾尔语却有来自汉语的分类词？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汉语对维吾尔语分类词的影响或可追溯至回鹘汗国时期(744-840)(Yang 2015)。如 3.1 节所述，维吾尔人的先祖是于蒙古高原建立回鹘汗国的回鹘人，而回鹘汗国因曾帮助唐朝镇压安史之乱，得到唐朝给予的贸易特权，故与唐朝维持友好紧密的关系(Csató and Johanson 2015)。在回鹘汗国灭亡，维吾尔族于新疆地区形成后，其与汉人的交流依然持续，因此维吾尔语所继承的与汉语交流之历史是从八世纪持续至今的漫长时间；且在这段历史的初期，回鹘人是比今天的维吾尔族在地理上更接近汉语区的。

反之，保安语、康家语等位于青海-甘肃地区的蒙古语族语言都是由蒙古帝国通行的中古蒙古语(Middle Mongolian)衍生而来(Janhunen 2003; Lefort 2017)，可见这些民族是元朝时由强势的蒙古族与当地入融合而成，蒙古语此时为强势语言，待元朝灭亡后，汉语的影响优势才浮现，因此这些语言与汉语的交流史远比维吾尔语短，故其中有些语言没有来自汉语的分类词是十分合理的。

最后，满-通古斯语族中的鄂温语、涅吉达尔语分布于西伯利亚东部，赫哲语则横跨西伯利亚及中国黑龙江省北部(Tsumagari 1997)，这些地区的农业条件不佳，也不若甘肃、青海、新疆地区是中国和中亚地区文明互动的必经之处，汉人在历史上并无诱因与当地民族大规模、常态性接触；清朝对其境内赫哲族的控制力似乎比对鄂温克族更弱，一直到光绪皇帝时期才将整个赫哲族纳入官僚系统的统治，且基层官员仍由本族人担任(E 2018)。因此，这些语言可能并没有与汉语及满语充分接触，因而没有借用分类词。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ATKNINE, Victor. 1997. The Evenki language from the Yenisei to Sakhalin. In Hiroshi Shoji and Juha Janhunen, eds. *Northern Minority Languages: Problems of Survival*, 109-121.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BATU, Ali and Heysem Batu. 2018.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urkish gastronomy from ancient times until today. *Journal of Ethnic Foods* 5(2): 76-82.
- BRUNN, Stanley D., Stanley Toops and Richard Gilbreath. 2012. *The Routledge Atlas of Central Eurasian Affairs*. New York: Routledge.
- BU, Lianzeng 步连增. 2011. Hanyu mingliangci qi yuan zaitan 汉语名量词起源再探(The origin of numer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 revisited). *Jinan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济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 89-96.
- BURBIEL, Gustav. 2018. *Tatar Grammar*. Stockholm/Moscow: Institute for Bible Translation.
- CHEN, Chao-Yang 陈昭扬. 2014. Lyuelun jinchao tongzhide yingxiang jiqi lishi diwei 略论金朝统治的影响及其历史地位(On the influence of the Jin Dynasty and its historical status). *History Education* 历史教育 20: 141-178
- CHEN, Xinyi 陈义新. 2015. *Zhongguo beifang Aertaiyuyan yuxu leixing yanjiu* 中国北方阿尔泰语言语序类型研究(A study of the word order typology of Altaic languages in northern China).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CHEN, Zongzhen 陈宗振. 1986. *Tataeryu jianzhi* 塔塔尔语简志(A Brief Description of Tatar).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CHEN, Zongzhen 陈宗振 and Yuanchun Lei 雷远春. 1985. *Xibuyuguyu jianzhi* 西部裕固语简志(A Brief Description of West Yugur).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CHENG, Shiliang 程适良 and Abudureheman 阿不都热合曼. 1987. *Wuzibiekeyu jianzhi* 乌孜别克语简志(A Brief Description of Uzbek).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CHINGGELTAI 清格尔泰. 1988. *Tuzuyu he mengguyu* 土族语和蒙古语 (Monguor and Mongolian). Hohhot: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 CORNELL, Svante E. 2011. *Azerbaijan since Independence*. London: Routledge.
- CSATÓ, Éva Á. and Lars Johanson. 2015. *The Turkic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
- ENGESÆTH, Tarjei, Mahire Yakup, and Arienne Dwyer. 2009. *Greetings from the Teklimakan: a Handbook of Modern Uyghur: Volume 1*.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Scholarworks.
- GENG, Shimin 耿世民 and Zengyang Li 李增祥. 1985. *Hasakeyu jianzhi* 哈萨克语简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Kazakh).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GIL, David. 2013. Numeral Classifier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ed. Matthew S. Dryer and Martin Haspelmath, Chapter 55.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als.info/chapter/55>, Accessed on 2019-11-20.)
- GÖKSEL, Aslı and Celia Kerslake. 2000. *Studies on Turkish and Turkic Languag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GREENBERG, Joseph. [1972]1990. Numerical classifiers and substantival number: problems in the genesis of a linguistic type. In K. Denning and S. Kemmer, eds. *On Language. Selected Writings of Joseph H. Greenberg*.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66-193. [First published 1972 in *Working Papers on Language Universals* 9: 1-39. Stanford, CA: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 HAN, Qikun 韩启昆. 1994. Xibozu xiqian shubian luxian tujie 锡伯族西迁戍边路线图解 (Illustrations of Xibe people's migration routes to the western frontier). *Manzu yanjiu* 满族研究 1994.2: 90-94.
- HER, One-Soon 2012. Distinguishing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A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 and implications. *Lingua* 122.14: 1668-1691
- HER, One-Soon and Bing-Tsiong Li. To appear. A Single origin of numeral classifiers in Asia and Pacific: A hypothesis. To appear in Marc Tang and Marcin Kilarski, eds. *Nominal Classification in Asia:*

- Functional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U, Zengyi 胡增益. 1986. *Ewenkeyu jianzhi* 鄂温克语简志(A Brief Description of Evenki).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JANHUNEN, Juha. 2000. Grammatical gender from east to west. In Barbara Unterbeck, Matti Rissanen, Terttu Nevalainen, and Mirja Saari, eds. *Gender in Grammar and Cognition, Part II: Manifestations of Gender*, 689-797.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 2003. *The Mongolic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
- KIRYU, Kazuyuki. 2009. On the rise of the classifier system in Newar. In Yasuhiko Nagano, ed. *Issues in Tibeto-Burm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75), 51-69.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KORNFILT, Jaklin and Klaus von Heusinger. 2009. Specificity and partitivity in some Altaic languages. In R Shibagaki and R Vermeule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5th Workshop on Formal Altaic Linguistics*,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40. Cambridge: MIT Press.
- KROEBER, Alfred L. 1940. Stimulus Diffus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2.1: 1-20. <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0qn3s0z7>
- LEFORT, Julie. 2017. Contact-induced change in the Dongxiang language: The emerging category of classifier.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46: 174-193.
- LEHMANN, Christian. 2015.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3rd edition. Berlin: Language Science Press.
- MAHOOTIAN, Shahrzad. 1997. *Persian Descriptive Grammars*. London: Routledge.
- MANSUR, Salih. 2018. *Crimean Tatar Languag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LaGuardia Community College.
- MOINFAR, Moh. Djafar. 1980. Les classificateurs en persan. In Gunter Brettschneider and Christian Lehmann, eds. *Wege zur universalienforschung*.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Beiträge zum 60. Geburtstag von Hansjakob Seiler, 317-320. Tüb-ingen: G. Narr.
- LI, Shulan 李树兰 and Qian Zhong 仲谦. 1986. *Xiboyu jianzhi* 锡伯语简志(A Brief Description of Xibe).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LIN, Lianyun 林连云. 1985. *Salayu jianzhi* 撒拉语简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Salar).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LIU, Jingxian 刘景宪, Eping Zhao 赵阿平, and Jinchun Zhao 赵金纯. 1997. *Manyu yanjiu tonglun* 满语研究通论 (A General Study of Manchu). Heilongjiang: Heilongjiang chaoxian minzu chubanshe.
- LIU, Xianzhong 刘显忠. 2014. Kelimiya bandao de lishi bianqian 克里米亚半岛的历史变迁 (The history of Crimean Peninsula). *Dangdai shijie shehuizhuyi wenti*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4 (2): 95-100.
- MA, Wei 马伟. 2008. Saluer wangchao yu salazu 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 (The Salur Dynasty and the Salars). *Qinghai minzu yanjiu* 青海民族研究 19: 96-106.
- MA, Wei 马伟. 2009. Yuyan jiechu yu salayu de bianhua 语言接触与撒拉语的变化 (Contact Induced Changes of the Salar Language). *Qinghai Minzu Xueyuan xuebao shehuikexue ban*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3.35: 29-35.
- SCHWARZ, Henry G. 1984. *The Minorities of Northern China: A Survey*. Bellingham: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 SLATER, Keith W. 2003. *A Grammar of Mangghuer*. London: Routledge.
- STILO, Don. 2018. Numeral classifier systems in the Araxes-Iran linguistic area. In William B McGregor and Wichmann, Søren, eds. *The Diachrony of Classification Systems*, 135-16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UZHUER, Ounan 欧南. 乌珠尔. 2004. *Dawoeryu kailun* 达斡尔语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Daur). Heilongjiang: Haerbin chubanshe.
- WANG, Qingfeng 王庆丰. 2005. *Manyu yanjiu* 满语研究 (A Study of Manchu).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WEIDERT, Alfonso. 1984. The classifier construction of Newari and its historical Southeast Asian background. *Kailash: A Journal of Himalayan Studies* 11.3-4: 185-210.
- WU, Yuanfeng and Zhiqiang Zhao 吴元丰、赵志强. 1984. Heilongjiang diqu xibozu de lishi bianqian 黑龙江地区锡伯族的历史变迁 (The history of Sibe people in Amur area). *Beifang wenwu* 北方文物 1984 (3): 4-8
- YANG, Fuxue 杨富学. 2015. "Yuguxue" ying qingqi hexi huihu yanjiu de daqi "裕固学"应擎起河西回鹘研究的大旗 (The Yugur study

should raise the banner of the study on Hexi Uyghur). *Hexi xueyuan xuebao* 河西学院学报 31: 1-7.

ZHAONASITU 照那斯图. 1981. *Tuzuyu jianzhi* 土族语简志(A Brief Description of Monguor). Beijing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ZHAO, Xiangru 赵相如. 1985. *Weiwueryu jianzhi* 维吾尔语简志(A Brief Description of Uyghur).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ORIGIN OF SORTAL
CLASSIFIERS IN ALTAIC LANGUAGES

Shen-An Chen¹ MarcAllassonière-Tang²

Yong-Ping Liang¹ One-Soon Her^{1,3}

¹National Chenghi University, Taipei

²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aris

³Tunghai University, Taichung

ABSTRACT

The grammatical feature of sortal classifiers, common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is also found in 15 of the 65 Altaic languages we have examined, though the classifiers are far fewer and used optionally. These observations suggest that the Altaic classifier systems are not indigenous. Based on the Single Origin Hypothesis that Chinese is the only language with an indigenous classifier system, we propose that the rise of classifiers in Altaic i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neighboring classifier languages. Having first confirmed that the putative classifiers in these 15 languages are genuine classifiers, we then examine the phonological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assifiers identified in each language and detect the influence from either Chinese or Persian. Taking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we suggest that classifier languages east of Uyghur were influenced by Chinese, while those to the west are influenced by Persian; Uyghur itself was influenced by both. Assuming that Persian classifiers are not indigenous either,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Single Origin Hypothesis is applicable to classifier languages in Altaic.

KEYWORDS

Sortal classifier Mensural classifier Altaic languages Language contact
Single Origin Hypothesis

阿爾泰語言中分類詞的起源與分布 輔助材料

在此份檔案中我們探究 15 個阿爾泰分類詞語言中分類詞的語音特性及語意概念，判斷是否與周邊語言相似，並推敲出其可能的來源。分兩階段論述：首先透過 Her (2012) 所提出之「被乘數」和「必要特徵」等概念，檢視文獻提及的分類詞是否正確；如該語言確有分類詞，則根據其語音和語意等線索，推測其分類詞之借用來源為漢語或是波斯語。表(一)為 14 個波斯語分類詞及其用法 (Moinfar 1980；引自 Lehmann 2015)。

表(一) 波斯語分類詞 (Moinfar 1980, in Lehmann 2015, pp.317-320)

序號	分類詞	分類詞語意	計算物體類別	例句用法	語意
1	tā	“piece, unit”	person, animal, plant, object	se tā asb	“three horses”
2	nafar	“person”	human being	yek nafar kešāvarz	“one peasant”
3	tan	“body”	human being	do tan mozdūr	“two workers”
4	raʔs	“head”	animal	yek raʔs gāv	“one head of cattle”
5	dāne	“grain, piece”	small animal/plant/object	se dāne sīb	“three apples”
6	ʕadad	“number”	small animal/plant/object	do ʕadad medād	“two pencils”
7	šomāre	“number”	periodical	do šomāre maǰalle	“two journals”
8	ǰeld	“binding, volume”	book	čahar ǰeld ketāb	“four books”
9	taxte	“board, piece”	elongated object	yek taxte farš	“one carpet”
10	farvand	“wooden bar”	machine	se farvand havā-peymā	“three airplanes”
11	pārče	“piece”	utensil	dah pārče zarf	“three vessels”
12	bāb	“door”	locality	se bāb dokān	“three shops”
13	halke	“ring”	jewelry	do halke angoštar	“two rings”
14	dast	“hand”	set	yek dast lebās	“one dress”

我們將以表(一)的清單判斷一個語言的分類詞是否受波斯語的影響。漢語方面，我們將以何萬順與林昆翰(2015)的研究作為漢語的分類詞清單。透過這兩個語言的分類詞，我們依序檢視突厥語族中的 9 個分類詞語言、蒙古語族中的 3 個分類詞語言以及滿-通古斯語族中的 3 個分類詞語言。

1 突厥語族分類詞之起源

以下討論前述 9 個突厥語族語言：韃靼語、土耳其語、克里米亞韃靼語、阿塞拜疆語、撒拉語、西部裕固語、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及烏茲別克語的分類詞起源。首先討論韃靼語。其分類詞並非必要，使用 [數詞+名詞]即可表達正確語意 (例句 1a)；如使用分類詞，則插入數詞和名詞之間形成[數詞+分類詞+名詞] 的結構，見例 (1b)(陳宗振 1986)。

(1) 韃靼語中的分類詞 (陳宗振 1986, pp.68, 70)

a. eki	akətʃtə	b. bir	nəfər	wəkil
二	木匠	一	位	代表
‘兩位木匠’		‘一位代表’		

從陳宗振 (1986) 和 Burbiel (2018) 整理的韃靼語分類詞列於表(二)。後者將量詞和分類詞稱為“noun classifier”。透過該表與表(一)的波斯語分類詞對照後，可觀察到韃靼語分類詞(1)“nafar”和(3)“dāne”與波斯語分類詞(2)“nafar”，(5)“dāne”發音和功能一致，同時借用分類詞的概念及詞彙；而表(二)中最後兩個分類詞(4)“typ”和(5)“baʃ”從發音無法辨識來源，且為韃靼語固有詞彙，故視為韃靼語固有名詞轉變成的分類詞，也就是僅借用了分類詞的概念。

表(二) 韃靼語分類詞 (陳宗振 1986, pp.70-71；Burbiel 2018, p.133)

序號	分類詞	分類詞語意	例句用法	語意
1	nafar	「人」	bir nəfər wəkil	「一位代表」
2	tal	「柳條」	bir tal jip	「一根線」
3	dāne	「個」	bir meə danā kirpeh	「一個蘋果」
4	typ	「根」	bir typ tʃije	「一棵櫻桃樹」
5	baʃ	「頭」	bir baʃ sarəmsaq bir baʃ kədʒe	「一頭大蒜」 「一頭羊」

綜上分析，推測韃靼語分類詞除了受其他語言影響而借用外，也以固有詞中與源頭相對應的詞作分類詞。因為波斯語和韃靼語有部分分類詞一致，推測波斯語是韃靼語分類詞的主要源頭，從地理位置的推測也是如此。

土耳其語方面，Underhill (1980) 將量詞和分類詞稱為“counting word”。其中共有五個“counting word”符合本研究之分類詞數學定義，列於表(三)。其中以(1)“tane”最為普遍使用，發音和功能與表(一)中波斯語分類詞(5)“dane”相似，功能廣泛，能計算大部分名詞，但不具備獨立的語意，不能單獨出現於句中，只在計算名詞數量時才會使用。該現象十分符合分類詞的特性：在計算物體的時候語意是累贅的，僅帶有數學中「乘一」的功能。而表(三)中計算人類名詞的分類詞(2)“kişi”是土耳其語原有的詞彙，其語意是「人」，推測是受波斯語的分類詞(2)“nafar”影響而借用其概念，將土耳其語中具有相同語意的名詞轉變而來的分類詞。此外，Underhill (1980) 對分類詞(4)“parça”沒有明確的定義，僅從例句得知用於計算紙類名詞。雖其發音和波斯語的分類詞(11)“pārçe”相似，但用法卻與用來計算「用具」相異。對於這種現象，本文初步推測此分類詞應是受波斯語影響後，經過一段時間的語言發展在土耳其語中衍生出更多用法造成的結果。

表(三) 土耳其語分類詞及量詞 (Underhill 1980, pp.126-129)

a : 分類詞				
序號	分類詞	計算名詞類別	例句用法	語意
1	tane	大部分名詞	yedi tane	「七個(名詞)」
2	kişi	人類名詞	otuz kişi	「三十位(人)」
3	baş	動物		
4	parça		beş parça kağıt	「五張紙」
5	aded	與“tane”用法相似 適用於正式場合		
b : 量詞				
序號	量詞	量詞語意	例句用法	語意
6	kutu	「盒子」	üç kutu kalem	「三盒筆」
7	bardak	「杯子」	bir bardak su	「一杯水」

雖然 Underhill (1980) 缺少部分分類詞的用法，但在 Schaaik (1996) 中記錄了關於分類詞“adet”和“baş”的例句 (2a) 和 (2b)。其中分類詞“adet”雖無詳細敘述其語意，但透過例句可知和表(一)中的波斯語分類詞(6)“‘adad”發音和用法非常相似，皆可用於計算大部分名詞。而表(三)中分類詞(3)“baş”與波斯語中有對應語意的分類詞(4)“‘raʔs”發音有些差異，但考量其概念相同，皆用「頭」計算動物，因此和韃靼語相同，皆將其視為僅借用概念而使用固有詞彙的分類詞。土耳其語當中也有不少量詞，與分類詞佔有相同的句法位置，與其他語言的量詞相同，用法比分類詞彈性許多，且皆是由名詞轉變而來。

(2) 土耳其語中的分類詞 (Schaaik 1996, p.96(54))

a. alti	Baş	inek	b. üç	adet	fotograf
六	頭	牛	一	(分類詞)	相片
‘六頭牛’			‘三個相片’		

從表(三)來看，分類詞數量依舊不多，使用上也屬於選擇性；但土耳其語相較於其他突厥分類詞語言，已從波斯語直接借用了較多的分類詞。也因緊鄰波斯語區的關係，除分類詞外，也在語言發展過程中借用許多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名詞及詞根衍生其他詞彙，足見這兩種語言對土耳其語影響之深。這種現象相當符合第三節根據地理分布的預測，故將土耳其語歸類於受波斯語影響之分類詞語言。

克里米亞韃靼語的分類詞也是選擇性的，排列順序是[數詞+分類詞/量詞+名詞]。在 Kavitskaya (2010) 中，我們歸納出四個符合定義的分類詞及些許量詞，其分類詞的發音及用法與上述的韃靼語幾乎完全相同，且都只存在數量不多的分類詞以及量詞。雖然並未提及分類詞的來源，但可以發現表(四)中最顯著的還是用於計算人類名詞的分類詞(4)“nefer”和可以計算大部分名詞的分類詞(1)“dane”。這兩個與表(一)中的波斯語最為相似的分類詞，同樣也出現在克里米亞韃靼語中。計算動物的分類詞(2)“baş”和韃靼語相同，其本意為「頭」，但計算植物幼苗的分類詞(3)“tip”本意為「地面」，雖與表(二)中韃靼語的分類詞(4)“tip”同音且分類詞用法相同，但名詞層面具有不同的語意，在韃靼語中，語意為「根」；這應是語言變遷造成的結果，推測為藉由借用分類詞的概念而產生。

表(四) 克里米亞韃靼語分類詞和量詞 (Kavitskaya 2010, p.50)

a : 分類詞				
序號	分類詞	計算名詞類別	例句	語意
1	dane	大部分名詞	ytj dane oda	「三個房間」
2	baf	動物	otuz baf qoj	「三十頭羊」
3	typ	植物幼苗	dört typ alma	「四棵蘋果樹」
4	nefer	人類名詞	eki nefer adam	「兩位人」
b : 量詞				
	量詞	量詞計算類別	例句	語意
5	tilim	切片狀物體	bir tilim qavun	「一片檸檬」
6	tjift	成雙的物體	bir tjift ajaqqap	「一雙鞋子」
7	taqum	成套的物體	bir taqum tjarnaşur	「一套床單」

量詞方面與土耳其語和韃靼語相差不少，也顯示量詞雖與分類詞佔有同一句法位置，但相較於分類詞，量詞具有額外語意且易於新創這種更為彈性的現象。此外，因西元 13 至 14 世紀時，伊斯蘭教成為克里米亞半島的主要宗教，透過宗教文化的影響，克里米亞韃靼語中的許多詞彙和詞綴都是從波斯語或阿拉伯語直接傳入，大量的外來詞彙逐漸影響固有的語言結構。也因其位於所有阿爾泰分類詞語言中最西北方的位置，應當鮮少與漢民族直接接觸；如有，其影響程度也遠不及波斯語。綜合以上幾點，將克里米亞韃靼語的分類詞推測為受波斯語影響而產生。

阿塞拜疆語的地理位置在突厥分類詞語言中，最靠近波斯語地區。可以預測阿塞拜疆語受波斯語影響的程度會大於其他語言。阿塞拜疆語計算名詞的排列方式是簡單的[數詞+名詞]，如有分類詞或量詞則置於兩者間。Lee (1996) 詳細的列出阿塞拜疆語的分類詞和量詞，如表(五)所示。除了在其他受波斯語影響的分類詞語言中常見的(1)“nəfər”、(3)“dənə”、(4)“baş”以外，還有用於計算衣服的分類詞(2)“dəst”，對照表(一)中的波斯語分類詞(14)“dast”，可以發現發音非常相似，且兩個分類詞都是用來計算相同的名詞類別。此外，與其他分類詞語言不同的是，分類詞(4)“baş”在阿塞拜疆語中除了計算牲畜外，還可在非正式場合用來計算人類名詞，其餘分類詞在使用上皆與其他語言的相似分類詞無甚差別。量詞方面，(6)“ovuc”本意為「手掌」，並無固定的數值，僅表示用手掌捧起的數量；除了固有量詞外，也從波斯語當中借用量詞(8)“cərak”代表數學上“1/4”的意義，必須與數詞一起使用且僅用於計算重量和長度；在近代也從英文借用(9)“kilo”「公斤」、「metr」「米」等制式單位量詞計算重量和距離。

表(五) 阿塞拜疆語的分類詞以及量詞 (Lee 1996, pp.74-75)

a : 分類詞				
序號	分類詞	計算名詞類別	例句	語意
1	nəfər	人或是人類名詞	on nəfər pəhlivan	「十位勇士」
2	dəst	成套的衣服	iki dəst libas	「兩套裙子」
3	dənə	大部分名詞	iki dənə şam bir dənə hərf	「兩支蠟燭」 「一封信」
4	baş	牲畜或非正式的稱呼人	yüz baş qoyun beş baş adam	「一百頭羊」 「五個人(非正式)」

b: 量詞				
序號	量詞	計算名詞類別	例句	語意
5	cüt	成雙的物體	bir cüt başmax	「一雙鞋子」
6	ovuc	小碎片或是粉狀物體	bir ovuc qızıl	「一捧黃金」
7	dəstə	成群或是成捆的物體及人類名詞	bir dəstə gül bir dəstə qoşun	「一束花」「一 群士兵」
8	çərək	四分之一的重量或長度	bir çərək kilo	「四分之一公 斤」
9	kilo	重量	on kilo qənd	「十公斤糖」

因地緣相近的關係，阿塞拜疆語受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的影響非常全面。無論是最表層的詞彙和詞綴，或是最深層的句法結構，都已根深蒂固存在其中，整個語言系統似乎並不存在受漢語影響的證據。綜合上述觀察結果，我們幾乎可以推斷阿塞拜疆語的分類詞是由波斯語而來，其語言特性也給這種推測強而有力的證明，同時也呼應了這兩種語言在地緣上接近的關係。

承第三節所提及，因長期與漢民族雜居，使撒拉語受漢語影響極深，在突厥語言中屬於受漢語影響較多的語言。從林連雲 (1985) 提供的語料來看，無論從分類詞的排列方式或借用詞彙的角度都可得到驗證。原始撒拉語計算名詞數量的排列方式是 [名詞+數詞]，與漢語相反(句 3a)；然而當分類詞加入計算名詞時，會使撒拉語的排列結構發生改變。除了像句 (3c) 直接在數詞後加上分類詞變成 [名詞+數詞+分類詞/量詞] 的結構外，還可以切換成如例句 (3b) 所示，名詞片語的排列方式會由 [名詞+數詞] 轉變成和漢語相同的 [數詞+分類詞/量詞+名詞]。無論哪一種句型皆不影響語意。

(3) 撒拉語中的分類詞 (林連雲 1985, pp.54, 104)

a. şu bər ğin bər
書 一 信 一
‘一本書一封信’

b. bər bun şu bər fun ğin
一 本 書 一 封 信
‘一本書一封信’

c. men aña ağ bər zanzi verdzi
我 他 麵條 一 碗 給
‘我給他一碗麵條’

詞彙方面，根據表(六)所示的六個分類詞可發現，前三個分類詞「棵」、「朵」、「頭」在撒拉語中發音分別為(1)“dyp”、(2)“gudu”、(3)“bağ”，與漢語發音皆相差甚遠，而後三個分類詞對應到漢語的語意為「本」、「張」、「封」，在撒拉語的發音分別是(4)“bun”、(5)“dʒoŋ”、(6)“fun”，發音皆與所對應的分類詞相似。本文推測前三者所計算的名詞皆是存在於大自然中的物體，應是撒拉語固有的詞彙，直接利用固有名詞轉變成分類詞；而(4)“bun”、(5)“dʒoŋ”、(6)“fun”等分類詞所計算的名詞是書本等紙類物體，皆不是來自於大自然，屬於人工製造的產物，對突厥語遊牧民族來說，書籍和紙張這類物品是屬於漢民族所引進，本就不存在於撒拉語的詞彙概念，所以從漢語借用這些外來詞彙時，也自然使用漢語的分類詞計算。另外，從量詞也可看到許多漢語的單位量詞借用到撒拉語中，也間接說明撒拉人在歷史上應與漢文化有相當密切的交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撒拉語的分類詞是受漢語影響而

產生，但當中卻有與其他受波斯語影響之分類詞語言語音和功能相似的(3)“baʃ”和(1)“dyp”兩個分類詞，我們可以在後續的語言當中觀察是否持續存在此現象。

表(六) 撒拉語的分類詞和量詞 (林連雲 1985, pp.54, 138)

a：分類詞		
序號	分類詞	分類詞語意
1	dyp	「棵」
2	gudu	「朵」
3	baʃ	「頭」
4	bun	「本」
5	dʒoŋ	「張」
6	fun	「封」
b：量詞		
序號	量詞	量詞語意
7	sun	「吋」
8	dzoŋ	「丈」
9	li	「里」
10	mu	「畝」
11	gonʃin	「升」
12	dʒombax	「串」

撒拉語受漢語影響極深，除了最簡單的借用分類詞詞彙以外，還進一步滲透到句法結構中，使撒拉語使用分類詞計算名詞時會改變舊有的詞彙排列方式。從這兩點看來，皆可看出漢語分類詞系統在撒拉語中留下極為深刻的足跡，也證明撒拉語的分類詞系統很可能是藉由漢語影響而來。儘管從歷史文化及語料可以得知撒拉人與部分突厥語言的民族一樣，因信奉伊斯蘭教的關係，從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借用過不少詞彙，不過因為地理位置離漢語區較近，使相對弱勢的波斯語分類詞系統無法滲透至撒拉語當中。

西部裕固語中無論是量詞或分類詞，絕大多數都是由漢語影響而來。在陳宗振、雷遠春(1985)所敘述的語料中，西部裕固語存在相當豐富的量詞及分類詞。其中尤以量詞為發達，如表(七)所示，存在計算容量、重量、長度和面積的量詞。在表(七)當中，前面三個分類詞(1)“fən”、(2)“dzaŋ”和(3)“dʒenzi”的發音皆與漢語的「份」、「張」以及「件」相似，推測應是受到漢語分類詞的概念所影響。

表(七) 西部裕固語的分類詞和量詞(陳宗振、雷遠春 1985, pp.78-79)

a：分類詞		
序號	分類詞	分類詞語意
1	fən	「份」
2	dzaŋ	「張」
3	dʒenzi	「件」
4	dəp	「根/棵」
5	baʃ	「頭」
b：量詞		
序號	量詞	量詞語意
6	sun	「吋」
7	do	「刀(計算紙類)」
8	due	「對/雙」

9	mu	「畝」
10	goŋdʒiŋ	「公斤」
11	tuj	「桶」

除表格中提到的量詞外，還有：“dan”「石」、「li」「里」、「tʂizi」「尺」等量詞。從發音即可判定這些分類詞及量詞的來源就是漢語。從例句(4)也可發現和撒拉語相同的現象：發音幾乎完全與漢語相似的分類詞，用來計算的名詞多半不是西部裕固族文化中原有的產物，而是人工製造的物品，如例句(4)，因其是從其他強勢文化引進的概念，並非存在於固有詞彙中。

(4) 西部裕固語中的分類詞 (陳宗振、雷遠春 1985, pp.78-79)

a. ʃigə	dzaŋ	keyde	b. uʃ	dʒenzi	daji
二	張	紙	三	件	大衣
‘兩張紙’			‘三件大衣’		

西部裕固語和撒拉語相同，歷史上與漢語有相當密切的交流，即使還是有些許從波斯語或阿拉伯語借用的詞彙，不過地理位置遙遠，詞彙量也極少，影響層面不廣，不足以傳遞至句法結構中，主要還是受漢民族的語言文化影響，使語言當中存在許多漢語詞彙。借用詞彙之廣泛，不僅量詞和分類詞，還借用漢語的動詞作詞根，再加上自身語言的詞綴延伸語意，擴充自身的詞彙數量，甚至連加強語意的虛詞「吧」，都可見於西部裕固語當中，足以說明漢語影響極為深刻。

而撒拉語的特殊情況同樣也發生在西部裕固語中，只要是突厥語族的分類詞語言皆會包含和表(七)中(5)“baʃ”和(4)“dəp”相似的兩個分類詞，在各語言中的功能和發音皆十分相近；我們認為這兩個分類詞或許在突厥語言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可能對於突厥語言的分類詞起源扮演關鍵的角色。

維吾爾語位於波斯語及漢語中間，較難依其地理位置推測分類詞來源。趙相如 (1985) 指出，在維吾爾語的發展過程中，因與漢文化有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吸收了漢語不少詞彙。約莫在 10 世紀初，隨著伊斯蘭教興起，阿拉伯語和波斯語也逐漸影響維吾爾語，故推測無論是漢語還是波斯語，對維吾爾語的分類詞及量詞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維吾爾語的分類詞也屬選擇性，在不影響語意的情況下基本皆可省略，相較其他阿爾泰分類詞語言，分類詞已屬相對豐富。表(八)的分類詞中，可以看到波斯語中出現最頻繁且使用功能最廣泛的分類詞(1)“dane”，以及計算人類名詞(7)“neper”，而量詞則有許多漢語甚至英語的詞彙；除此之外也有許多先前未曾出現的分類詞，如(4)“qanat”和(5)“əghiz”。這些從語音無法推測的分類詞，因地理位置特殊，在兩個分類詞影響源皆有可能影響的情況下，必須依靠例句及分類詞的固有語意分析其來源。

表(八)維吾爾語分類詞及量詞
(趙相如 1985, pp.62-63, 246; Engesæth et al. 2009, p.154)

a：分類詞		
序號	分類詞	分類詞語意
1	dane	「個 (用於物體)」
2	waraq	「紙」
3	baʃ	「頭」
4	qanat	「翅膀」
5	əghiz	「嘴巴」
6	tal	「柳條」

7	nəper	「個(用於人)」
b: 量詞		
序號	量詞	量詞語意
8	mo	「畝」
9	dziŋ	「斤」
10	tutam	「束」
11	qotan	「群體牲畜」
12	suŋ	「吋」
13	metir	「公尺」
14	kilogram	「公斤」

例句 (5a) 中用於計算建築的分類詞“əghiz”，參考表(八)中的分類詞(5)可知本意為「嘴巴」，對照表(一)的波斯語分類詞系統，與用來計算建築的分類詞(12)“bab”，語意為「門」的分類詞概念不同；而對照漢語，用於計算建築數量的分類詞「間」也不具有「嘴巴」的意義。另外，考慮到分類詞所具有的語意累贅的特性，用「嘴巴」的概念與「建築」連結似乎有點牽強。很有可能“əghiz”在歷史上有其他「建築」相關語意尚不得而知，故關於這個分類詞，在本研究中未有明確線索可推測其來源。

(5) 維吾爾語中的分類詞

a. üch əghiz öy

三 嘴巴 房

‘三間房屋’(Engesæth et al. 2009, p.154)

b. bir qanat ifik

一 翅膀 門

‘一扇門’(趙相如 1985, p.63)

c. bir waraq qεkez

一 張 紙

‘一張紙’(趙相如 1985, p.63)

例句(5b) 計算「門」的分類詞“qanat”為表(八)中的分類詞(4)，本意為「翅膀」。在波斯語分類詞中沒有與其對應的概念，其他受波斯語影響的分類詞語言中也沒有發現計算「門」的分類詞。反觀在漢語中用於計算「門」的分類詞為「扇」，現今語意多為「扇子」之意，但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扇」在古代也具有門扉的意義；與波斯語相比，以漢語的分類詞概念解釋似乎更為貼切。在漢語具有語意較為貼切之詞彙的情況下，我們將“qanat”視為受漢語概念影響的分類詞。例句 (5c) 中計算紙類的分類詞為表(八)中的分類詞(2)“waraq”，同樣沒有在先前的語言中出現過，屬於阿拉伯語詞彙，本意為「紙張」，相當符合分類詞的累贅語意定義。因在波斯語分類詞中沒有相對應的詞彙，所以很有可能是維吾爾語受其他語言影響產生分類詞的概念後，運用其他詞彙產生獨特的新分類詞；考慮其詞源，該分類詞較有可能是受波斯語影響而來。

綜合以上推論，維吾爾語十分獨特，是本研究中唯一同時受兩個分類詞源頭影響的語言。其分類詞大多是受波斯語或阿拉伯語的影響，但在量詞方面，漢語的影響就明顯許多。此結果相當符合維吾爾語位於漢語和波斯語之間的地理分布，同時也表現出同時受兩種文化影響所展現的獨特性。

根據耿世民、李增樣 (1985) 的研究，哈薩克語的量詞系統十分不發達，大多數情況下計算名詞數量時，僅需簡單的使用數詞和名詞即可。其中大部分量詞皆是由名詞轉變而來。雖僅提到許多哈薩克語的量詞是從漢語或是其他語言借用，但從表(九)來看，哈薩克語僅存在為數不多的分類詞。(1)“dana” 是受波斯語影響而產生的典型分類詞，其餘兩個分類詞(2)“typ” 和(3)“bas” 皆是突厥語言當中非常普遍的分類詞。雖這兩個分類詞的來源尚待討論，但考慮到明顯來自波斯語的(1)“dana”，初步推測為受波斯語的分類詞概念影響產生的。而在量詞方面，明顯可見受漢語「升」、「斤」和近代英文“kilogram”、“gram”影響而產生的量詞(9)“ʃəŋ”、(10)“dʒəŋ”、(7)“kilogram”、(8)“geram”。

表(九) 哈薩克語分類詞和量詞 (耿世民、李增樣 1985, pp.49, 237)

a：分類詞		
序號	分類詞	分類詞語意
1	dana	「個」
2	typ	「棵」
3	bas	「頭」
4	qabat	「層(樓)」
b：量詞		
序號	量詞	量詞語意
5	tonna	「噸」
6	metir	「米」
7	kilometir	「公里」
8	gəram	「克」
9	ʃəŋ	「升」
10	dʒəŋ	「斤」

歷史上哈薩克語從波斯語及漢語中皆借用過詞彙，早在 14 世紀時就已有語料顯示哈薩克語和波斯語有語言接觸現象，甚至受波斯語影響而借用某些句法後綴和許多音韻結構。雖然歷史上漢語也曾借用許多詞彙到哈薩克語中，但影響層面僅止於詞彙，並不如波斯語來得全面。綜合上述現象，哈薩克語與其他受波斯語影響之突厥分類詞語言相似，僅存在少量分類詞，使用頻率相當低，鮮少可以觀察到使用分類詞的例句，本篇研究所找到符合本文數學定義的分類詞僅有三個。且哈薩克語受波斯語的影響比漢語來得廣泛許多，此觀察結果也與第二節中哈薩克語的地理分布相當靠近波斯語區的事實相呼應。因波斯語的影響程度明顯大於漢語，故本文將哈薩克語的分類詞歸類在受波斯語影響之下。

程適良、阿不都熱合曼(1987) 指出烏茲別克語與維吾爾語的詞彙有百分之七十的比例是相似的，且語言中因為伊斯蘭教的傳入，有非常大量的波斯語和阿拉伯語借詞。且烏茲別克語的分類詞不是非常發達，為非必要的存在，使用與否並不影響語意。表(十)中前兩個分類詞(1)“nəfær” 和 (2)“dʌnæ” 幾乎都會出現在受波斯語影響的分類詞語言之中。相較於其他突厥語言，烏茲別克語的分類詞相對豐富一些。

表(十) 烏茲別克語分類詞 (程適良、阿不都熱合曼 1987, pp.54-55, 181)

a：分類詞		
序號	分類詞	分類詞語意
1	nəfær	「位」
2	dʌnæ	「個」
3	pərtʃæ	「塊」
4	tob	「棵」

5	bʌʃ	「頭」
b: 量詞		
序號	量詞	量詞語意
6	mo	「畝」
7	letir	「公升」
8	dʒiŋ	「斤」
9	kilometir	「公里」
10	tʃi	「尺」

(6) 烏茲別克語中的分類詞 (程適良、阿不都熱合曼 1987, pp.54-55, 181)

a. bir	næfær	kʌdir	b. bir	dʌnæ	lʌpʊʃkæ
一	位	幹部	一	個	燈泡
‘一位幹部’			‘一個燈泡’		

突厥語族在本研究中是唯一一個受到不同源頭影響而產生分類詞的語族；其另一特徵是，無論分類詞是受波斯語或漢語影響，皆會出現相同發音且具有相同功能的分類詞(4)“tob”「棵」和(5)“bʌʃ”「頭」¹，後續在第五節中會對此作出兩種假設並討論此特殊現象。

2 蒙古語族分類詞之起源

接著討論蒙古語族中達斡爾語、土族語和東鄉語的分類詞起源。達斡爾語雖是蒙古語族下的一個分類詞語言，但因地理位置位於中國東北，反倒與滿語的接觸較多，語言當中含有不少通古斯語族的特性，包含不少滿語借詞 (仲素純 1982)；不過在分類詞這方面，如例句(8)所示，除了計算書籍的分類詞「本」“dəbtle:n”明顯來自滿語“dəbdərin”，其餘分類詞從發音難以觀察出是受漢語或滿語影響而來的。

(7) 達斡爾語中的分類詞 (歐南·烏珠爾 2004, p.149, 恩和巴圖 1988, p. 252)

a. guarbn	hozhor	hails	b. taabn	zhag	warkl
三	棵	樹	五	件	衣服
‘三棵樹’			‘五件衣服’		
c. xoir	dəbtle:n	bitəg			
二	本	書			
‘兩本書’					

因此，我們必須從達斡爾語的其他分類詞相關特徵尋找線索，以釐清其分類詞的起源。其中一個線索是該語言的量詞，因量詞與分類詞在句法結構中占有相同的位置，如一語言借用另一語言的分類詞系統，應有相當大的機率同時借用該語言的量詞系統；而在達斡爾語的量詞中可以明顯觀察到漢語和滿語的影響，如「斤」“gin”、「尺」“tsii”、「吋」“sun”、「兩」“ljan”等量詞(仲素純 1982)，皆能看出是從漢語借用而來，以及受到滿語影響的量詞“manj”和“ado” (歐南·烏珠爾 2004)，皆是用來形容動物群體的量詞。歐南·烏珠爾 (2004) 也指出，

1 有位審查人細膩的觀察到，雖然在突厥語族都以發音近似 baʃ 且語意為「頭」的名詞作為分類詞使用，但在不同語言中可以適用的名詞類別卻不盡相同。例如，在西部的突厥語：韃靼語、土耳其語、克里米亞韃靼語、阿塞拜疆語，「頭」大多指的是動物，但在東部的突厥語，如維吾爾語、哈薩克語、烏茲別克語，「頭」多用於洋蔥與胡蘿蔔等根莖類蔬菜。感謝審查人深入的觀察，但由於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論證阿爾泰語言中分類詞的來源，因此在篇幅上不允許深究類似的分類詞在不同語言中使用範疇的不同。此一有趣的現象可於後續研究中仔細探究。

達斡爾語的分類詞和量詞大部分皆是由名詞轉變而來，但由於作為分類詞的時間久了，逐漸失去原有的意義，功能逐漸固化，不能單獨出現於句子當中，只能與數詞一起連用，也使我們必須從例句才能知道實際的使用方法。此外，達斡爾語的量詞系統十分發達，大部分名詞皆可直接插入名詞和數詞之間使用。從滿語和漢語借用的量詞壁壘分明，從滿語借來的量詞大多用於計算大自然的生物；相反的，受漢語影響而產生的量詞幾乎都是長度或重量等制式單位。也因達斡爾族的文化特色，語言當中用來計算生物群體的量詞會依照生物種類而有所差異，相較於漢語的「群」，顯得豐富許多，例如計算鳥類群體和人類群體的量詞“manj”，計算牲畜的量詞“ado”，計算人類群體的量詞“hangl”。

不過，單純依靠量詞起源來推測分類詞起源是有風險的；我們從哈薩克語和烏茲別克語的例子可見，分類詞和量詞來源不同的例子也是存在的。因此，尋找其他與分類詞相關且表現出其他語言影響的特徵，對推測達斡爾語分類詞的起源是必要的。對此，我們在達斡爾語中找到的第二個此類特徵是其分類詞和量詞共有的一個句法結構：達斡爾語的分類詞和量詞可以利用疊字的形式，代表「每個」或是「每次」的意思，如例句 Geri tialbastan [karq~] wanj aabei 「你們房牆皮在[塊塊]掉呢」是分類詞重疊的例子，Aold hig chas warsn , [man~] horgol , ito boojrj aabei. 「山裡下了大雪，一[群群]的野雞、沙半雞下來了」則是量詞重疊的例子 (歐南·烏珠爾 2004)。根據目前所蒐集到的語料，這種特性似乎是除漢語和滿語以外，在本文研究的 14 個語言當中鮮少出現的；這種以分類詞為基礎延伸語意的用法，也可以當作判斷達斡爾語分類詞來源的依據。

從以上兩點來看，達斡爾語的分類詞來源似乎難以歸入單一語言，因無論是滿語或漢語都可看出對達斡爾語的量詞及分類詞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故我們將其視為同時受滿語和漢語影響之分類詞語言。

在 Slater (2003) 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土族語的分類詞系統是屬於全面性的借用，同時使用漢語的數詞系統及分類詞。土族語的數詞系統幾乎被漢語取代，已鮮少使用者可以使用固有數詞計算到 20。現今仍在使用的土族語原生數詞系統只剩 1“nige”和 2“ghu”。在這種漢語絕對強勢的條件下，原生數詞系統勢必會被漢語完全取代。現代土族語可以同時容納漢語和土族語數詞系統的出現且使用上不會發生衝突，如欲使用土族語數詞系統計算名詞時不會出現分類詞(句 8a, 8b)；反之，如欲使用漢語分類詞系統計算名詞，則不可搭配土族語的原始數詞，必須與漢語數詞一起使用(句 8c, 8d)(Lefort 2017)。土族語中的分類詞數量不多，僅發現最普遍的「個」(句 8d)，還有句(8c)中的「條」，且發音與漢語皆相同。

(8) 土族語中的分類詞 (照那斯圖 1981, p.33, Slater 2003, pp.94, 95)

a. nige	nanxin	kong	b. xulunə	nəge
一	可憐的	人	葫蘆	一
‘一個可憐的人’			‘一個葫蘆’	
c. mer	liang=tiao	d. liang=ge	kong	
路	兩條	兩個	人	
‘兩條路’		‘兩個人’		

和撒拉語的情況相似，原始土族語在計算名詞時的排列方式與漢語相反 [名詞+數詞] (句 9b)，當分類詞加入的時候也只能出現在數詞之後(句 9d)。或許是因大量借用漢語數詞系統和分類詞，使土族語的語法結構逐漸發生改變，當計算名詞的時候可以允許 [數詞+ (分類詞) +名詞] 這種句型出現。儘管大部分計算方式仍維持 [名詞+數詞+(分類詞)] 的排列方式，但可以預測未來漢語的排列方式也會逐漸取代土族語的原始語法結構。

除分類詞系統外，照那斯圖 (1981)指出，長期以來，土族語從周邊突厥民族、藏語民族、漢民族的語言吸收許多詞彙，其中以漢語借用詞彙為大宗；土族語不只使用大量的漢語名詞和形容詞，還借用了漢語中最特別的虛詞，例如「吧」、「嘛」這種強調語氣的虛詞。

同時在音韻系統中，也會為了配合漢語詞彙發音而增加土族語缺少的音位，可見漢語對土族語影響的層面之廣，不僅僅只存在於分類詞和數詞系統而已。

東鄉語的分類詞可分為只能作分類詞的專門分類詞及可兼做名詞的分類詞。前者絕大多數都來自漢語，如「個」「gie」「張」「dzaŋ」、「條」「teiau」、「間」「dzian」等等(布和 1985)；後者則包含一些固有詞，如「位」「matu」(Lefort 2017)。東鄉語分類詞存在和土族語相似的限制，即漢語分類詞不能和其固有數詞搭配(句 9a, 9b)。但是，東鄉語中存在一類特殊分類詞，處於這條語法的灰色地帶：這類分類詞是從漢語借來，但在漢語中卻不是分類詞，而是被東鄉語借入後作為分類詞使用；這類分類詞可以搭配東鄉語固有數詞(句 9c, 9d) (Lefort 2017)。

(9) 東鄉語中的分類詞 (Lefort 2017, pp.179(1), 181(6), 182(8))

- | | | | | | |
|----------|-------|--------------|--------|------|------|
| a. dolon | ula | b. jiushijiu | gie | | |
| 七 | 山 | 九十九 | 個 | | |
| ‘七座山’ | | ‘九十九個’ | | | |
| | | | | | |
| c. nie | ganzi | jiesung | d. nie | kozi | oqin |
| 一 | 條 | 繩子 | 一 | 個 | 女人 |
| ‘一條繩子’ | | | ‘一個女人’ | | |

例句(10c)的分類詞“ganzi”來自漢語名詞「杆子」，該詞在漢語中並不作為量詞使用。較接近的分類詞「杆」只用於細長、圓柱形的物體，如「一杆槍」，不能用於例句(10c)中的「繩子」(Lefort 2017)。東鄉語使用者可能將「杆子」借用為與「杆」對應的分類詞後又拓展了它的語意，使其能用於同樣有細長形態的物品。例句(10d)的分類詞“kozi”也是同樣的例子：該詞來自當地的漢語方言名詞「棵子」，是顆粒的意思；但東鄉語將其借用為分類詞後將其功能擴展至如同漢語分類詞「個」的普遍性分類詞，而非僅用於顆粒狀的物體(Lefort 2017)。

這兩個例子顯示東鄉語對分類詞的借用已深入其語法結構，而不是單純借用具體的分類詞，因此東鄉語能選擇非分類詞的詞彙作分類詞，也能根據需求改變借詞的語意。從這個角度來看，“ganzi”、“kozi”雖是漢語借詞，卻也同時是東鄉語的原生分類詞，這可能是它們能與固有數詞併用的原因。不論是佔東鄉語分類詞絕大多數的漢語分類詞，還是東鄉語將漢語名詞活用為分類詞的現象，都在在顯示漢語對東鄉語分類詞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3 滿-通古斯語族分類詞之起源

分類詞起緣探討的最後對象是滿-通古斯語族中的滿語、鄂溫克語及錫伯語 3 個語言。滿族作為 12 世紀開始就與漢民族融合的民族，滿語分類詞系統屬本研究中最豐富多樣的一個，也因分類詞發展時間久遠且與漢民族接觸密集的緣故，從例句(11)中可發現滿語的分類詞大多發展成熟且使用固有詞彙作分類詞，因此與漢語分類詞發音相去甚遠，不能單從發音分辨來源。

(10) 滿語中的分類詞 (王慶豐 2005, pp.88, 117, 249, 289 ; 孫明 2010, p.73)

- | | | | | | | | |
|--------|----------|--------|----------|--------|----------|------|------|
| a. emu | afaha | hoosan | b. əm | buskun | sən | tuar | ilka |
| 一 | 張 | 紙 | 一 | 朵 | 好 | 看 | 花 |
| ‘一張紙’ | | | ‘一朵好看的花’ | | | | |
| | | | | | | | |
| a. əm | dəbdərin | bitkə | b. əm | da | gauliang | | |
| 一 | 本 | 書 | 一 | 棵 | 高粱 | | |

一個語言若從外部引進分類詞，且和分類詞來源語言長時間而密集的接觸，該語言便會因頻繁的使用分類詞而將該詞類內化進語法系統中，進而以和來源語分類詞語意相同的固有詞取代分類詞借詞，乃至創造語音和語意都與來源語分類詞沒有對應關係的固有分類詞；這個現象不是只發生在滿語中，我們可以從其他和漢語有長期接觸的分類詞語言，如下例中的日語(11a)、韓語(11b)、及屬壯侗語系的泰語(11c)看見相同的情形。這些語言繼承了古漢語中常見的[名詞+數詞+分類詞]語序(Her & Li to appear)，可見其與漢語互動的長久歷史。同樣的現象可能也發生在本研究中另一個無法從分類詞語音判斷來源的語言——達斡爾語中；考量到達斡爾族是契丹人的後裔，達斡爾語的前身契丹語可能從遼國時期就開始與漢語接觸，在金國滅亡遼國後又和女真語乃至其後代滿語長期互動，這些歷史都可能使達斡爾語的演化過程不斷暴露於分類詞的影響下，因而使其產生以固有詞取代借詞作分類詞的現象。但這個假說還需要更多的考證支持。

(11) 日語、韓語、泰語中的固有分類詞

a. tori ici wa
鳥 一 隻
‘一隻鳥’ (Janhunen 2000, p.694)

b. so dwu mari
牛 二 頭
‘兩頭牛’ (Janhunen 2000, p.694)

c. phûən sip khôn²
朋友 十 位
‘十位朋友’ (Vittrant and Tang 2020, p. 14)

雖然大部分滿語分類詞不能藉語音判斷來源，但還是能從少數量詞的發音還有部分分類詞的語意觀察到從漢語借用的痕跡。如表(十一)中的量詞(9)“sun”「吋」和(10)“gin”「斤」，和分類詞「間」的發音(4)“giyan”以及(8)“uju”和漢語一樣用「頭」的概念計算牲畜。從表(十一)的分類詞語意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分類詞功能和語意皆有關連性。滿語計算動物的量詞非常豐富，應是滿族生活習慣使然，會依據不同種類的動物使用不同的量詞，光是計算動物群體的量詞就已經發現至少四個；借用漢語的量詞皆屬制式單位，也顯出兩個族群的文化差異。

表(十一) 滿語分類詞和量詞 (王慶豐 2005, pp.47, 88, 116, 117, 128, 155, 162, 184；胡增益 1994, pp.10-11, 82, 315, 344, 935；劉景憲、趙阿平、趙金純 1997, pp.280；孫明 2010, p.74)

a：分類詞			
序號	分類詞	分類詞語意	計算名詞
1	afaha	「單子/篇章」	薄長形物體
2	da	「根本」	長條狀物體
3	dəbdərin	「書」	書本
4	giyan	「間」	房間
5	buksun	「花朵」	花
6	belge	「顆粒」	圓形物體

2 所引文獻中並無明述“khôn”是泰語原生的分類詞，我們採用本文的方法，即透過語音判斷該分類詞並非從漢語借用而來。

7	gargan	「柳枝/門扉」	植物/門
8	uju	「頭」	牲畜
b: 量詞			
序號	量詞	計算名詞類別	
9	sun (吋)	物體長度	
10	gin (斤)	物體重量	
11	şuru	物體長度	
12	dzuro	成雙物體	
13	məjin	群體人類	
14	adun	群體牲畜	
15	feniyen	群體人類/鳥類	
16	feye	群體牲畜	

儘管滿語分類詞相對其他語言已發展成熟且豐富，但孫明 (2010) 的研究顯示，滿語的分類詞使用頻率仍不如漢語來得頻繁和靈活。大多時候滿語計算名詞時仍會將分類詞省略不用，且許多漢語的分類詞用法在滿語當中是不存在的。漢語計算名詞的順序除了常見的 [數詞+分類詞+名詞] 外，還可以轉變成 [名詞+數詞+分類詞] 的形式且語意不會發生改變。反觀滿語則無此用法，只能使用上述例句中 [數詞+分類詞+名詞] 的排列方式。此外，滿語與達斡爾語相同，可以透過重複量詞或是分類詞表達「每個」的語意；不過孫明 (2010) 和歐南·烏珠爾 (2004) 的研究顯示，漢語的量詞或分類詞重疊形式除了與數詞結合以限定名詞的基本功能，還可以充當主語、謂語和副詞，如「個個都很新鮮」、「笑聲陣陣」、「世世相接」，但滿語與達斡爾語的這類重疊形式只能做限定詞與副詞，同樣表明這兩種語言的量詞與分類詞功能少於漢語。

縱觀歷史，某一語言能否影響周邊其他語言，往往跟該族群興盛與否有關。如漢語族群長久以來統治廣大中國土地，雖幾經朝代更迭，但語言文化的影響力始終能及於周邊國家。同樣的，滿人在中國東北崛起後進入中原地區建立大清帝國，即使國祚不如漢人政權還長，但畢竟國力盛極一時，理所當然滿語的語言文化也會影響周邊民族；尤其是和滿語同屬的其他通古斯語言，本就地屬歐亞大陸東北方，極為偏遠，加上古代交通不便，不易接觸漢族群，故推測其他通古斯語言受滿語的影響會比受漢語的影響還大，使滿語成為分類詞的影響源頭。

在第三節提及鄂溫克語是位於最北方的阿爾泰分類詞語言，其位置與漢語區之間夾雜滿語。滿語的分類詞系統雖不如漢語豐富強大，但因地理位置相較漢語區更靠近滿語區，鄂溫克語受滿語的影響應會比漢語還明顯，因此鄂溫克語的分類詞有可能是受滿語影響而產生，是屬於間接透過漢語而產生的分類詞，其分類詞的用法及發音應會與滿語更相似；也因屬於間接影響的關係，推測鄂溫克語的分類詞數量不如滿語來得多。另外，胡增益 (1986) 指出，儘管鄂溫克語中有許多漢語借詞，但大部分是屬近代的詞彙，例如「主席」“dzuufi”、「書記」“judzi”等詞彙，推測應是到了近代與漢語交流比較密切後才借用而來。胡增益 (1986) 的研究顯示，在一般情況下，使用簡單的 [數詞+名詞] 即可表達語意，如欲使用分類詞或量詞，只需放入數詞和名詞間。鄂溫克語僅存為數不多的量詞，例如「壺」、「捆」、「抱」等詞彙，其中最為特別的應是「抱」(句 12a)，應是表雙手可抱起的數量，是少數由動詞轉變成的量詞。在胡增益 (1986) 提到的鄂溫克語量詞中，大部分皆不符合本研究的分類詞數學定義，只有一個符合本研究定義的鄂溫克語分類詞「本」“debtər” (句 12b)。

(12) 鄂溫克語中的分類詞 (胡增益 1986, p.32)

a. əmun	xumul	xeena	b. əmun	dəbtər	bitəgə
一	抱	飼草	一	本	書
‘一抱飼草’			‘一本書’		

仔細觀察分類詞“debtər”與滿語的“dəbdərin”不僅發音相似，用法也相同，皆計算書籍數量，其語意是「冊」的意思，恰好與修飾的名詞語意相同，符合本文所謂分類詞帶有累贅語意的特性，也可推測此分類詞“debtər”原先也是作為名詞而後轉為分類詞。從例句來看，鄂溫克語的分類詞不僅數量少，且與滿語相似，故可歸納出鄂溫克語分類詞的傳遞過程是[漢語 → 滿語 → 鄂溫克語]，並將其視為直接受滿語影響，也就是間接受漢語影響而產生的分類詞語言。

錫伯語與鄂溫克語相同，歷史發展中與滿語交流密切程度遠高於漢語，且相較於鄂溫克人，地理位置更靠近南方；錫伯人被滿清統治的時間和控制程度也大於鄂溫克族，因此極有可能語言當中分類詞和量詞的豐富度會高於鄂溫克語。如表(十二)和例句所示，錫伯語分類詞與滿語分類詞極為相似，能夠簡單從語音得知前者乃是從後者借用而來。

表(十二) 錫伯語分類詞及量詞 (李樹蘭、仲謙 1986, pp.42, 55, 164-165)

a：分類詞		
序號	分類詞	分類詞語意
1	baχsən	「朵」
2	da	「棵」
3	faχ	「粒」
4	avχ	「張」
5	dœeyn	「根」
b：量詞		
序號	量詞	計算名詞類別
6	gin (斤)	重量
7	mu (畝)	面積
8	tsun (吋)	長度
9	adun	群體牲畜
10	məjin	群體人類
11	mitər (meter)	長度

除分類詞外，量詞方面可同時看到滿語、漢語和英語影響的證據，如計算牲畜群體的量詞(9)“adun”以及計算人類群體的量詞(10)“məjin”來自表(十一)中的滿語分類詞(14)adun、(13)məjin，其他用於計算長度、重量、面積和容量等制式單位大多從漢語及英語借用。錫伯語的分類詞也有像例句(13b)中，使用分類詞「朵」省略名詞「花」，這種在漢語中經常看見的用法。

(13) 錫伯語中的分類詞 (李樹蘭、仲謙 1986, pp.55,119)

a. əm	da	χəlin	b. ɛind	əm	baχsən	fəlgianiŋ	bukio
—	棵	樹	你	—	朵	紅色	給
‘一棵樹’			‘給你一朵紅色的(花)’				

雖然在李樹蘭、仲謙(1986)的研究中提到，錫伯語從錫伯族西遷至新疆前就已有從漢語借用詞彙的先例，但無論是從分類詞或量詞來看，皆可得知錫伯語受到滿語影響是高於漢語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有鑑於現今新疆和遼寧的錫伯族即使分隔兩地至少 250 年仍可溝通，可以得知分類詞的影響在錫伯族西遷前就已發展完善，也間接證明滿語的分類詞從無到有甚至進而影響其他語言，已經過了非常漫長的時間。

參考文獻

- BURBIEL, Gustav. 2018. *Tatar Grammar*. Institute for Bible Translation, Stockholm/Moscow.
- ENGESÆTH, Tarjei & Mahire Yakup & Arienne Dwyer. 2009. *Greetings from the Teklimakan: a handbook of Modern Uyghur: Volume 1*.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Scholarworks.
- HER, One-Soon 2012. Distinguishing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A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 and implications. *Lingua* 122.14: 1668-1691
- HER, One-Soon and Bing-Tsiung Li. To appear. A Single origin of numeral classifiers in Asia and Pacific: A hypothesis. To appear in Marc Tang & Marcin Kilarski (eds.), *Nominal Classification in Asia: Functional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John Benjamins.
- JANHUNEN, Juha. 2000. Grammatical gender from east to west. *Gender in Grammar and Cognition, part II: Manifestations of Gender* ed. by Barbara Unterbeck, Matti Rissanen, Terttu Nevalainen & Mirja Saari, 689-797.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KAVITSKAYA, Darya. 2010. *Crimean Tatar*. Languages of the world: Materials 477. Muenchen: Lincom Europa.
- LEE, Sooman Noah. 1996. *A Grammar of Iranian Azerbaijani*. Ph.D. dissertation in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Sussex, England
- LEFORT, Julie. 2017. Contact-induced change in the Dongxiang language: The emerging category of classifier.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46:174-193.
- LEHMANN, Christian. 2015.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3rd edition. Berlin: Language Science Press.
- MOINFAR, Moh. Djafar. 1980. Les classificateurs en persan. In Gunter Brettschneider & Christian Lehmann (eds.), *Wege zur Universalienforschung*.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Beiträge zum 60. Geburtstag von Hansjakob Seiler, 317-320. Tübingen: G. Narr.
- SCHAAIK, Gerjan van. 1996. *Studies in Turkish Grammar Turcologic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SLATER, Keith W. 2003. *A Grammar of Mangghuer*. London: Routledge.
- UNDERHILL, Robert. 1980. *Turkish Grammar*. MIT Press.
- VITTRANT, Alice and Marc Tang. 2021. *Classifiers in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In Paul Sidwell and Jenny Mathias (eds.), *Th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A comprehensive guide*, 733-772.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CHEN, Chao-Yang 陳昭揚. 2014. Lyuelun jinchao tongzhide yingxiang jiqi lishi diwei 略論金朝統治的影響及其歷史地位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Jin Dynasty and its historical status). *History Education 歷史教育* 20: 141-178
- CHEN, Zongzhen 陳宗振, LEI Yuanchun 雷遠春. 1985. *Xibuyuguyu jianzhi* 西部裕固語簡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West Yugur). Beijing 北京: Minzu chubanshe 民族出版社.
- CHEN, Zongzhen 陳宗振. 1986. *Tataeryu jianzhi* 塔塔爾語簡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atar). Beijing 北京: Minzu chubanshe 民族出版社.
- CHENG, Shiliang 程適良, A BU DU RE HE MAN 阿不都熱合曼. 1987. *Wuzibiekeyu jianzhi* 烏孜別克語簡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Uzbek). Beijing 北京: Minzu chubanshe 民族出版社.
- EN HE BA TU 恩和巴圖. 1988. *Dawoeryu he mengguyu* 達斡爾語和蒙古語 (Daur and Mongolian). Hohhot 呼和浩特: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GENG, Shimin 耿世民, LI Zengyang 李增樣. 1985. *Hasakeyu jianzhi* 哈薩克語簡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Kazakh). Beijing 北京: Minzu chubanshe 民族出版社.
- HER, One-Soon 何萬順, LIN Kun-Han 林昆翰. 2015. Fenleici yu linagci de qufen: yi Taiwan huayu weili 分類詞與量詞的區分：以台灣華語為 (Distinguishing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A Case study of Taiwa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s 漢語學報* 2015.4: 56-68.
- HU, Zengyi 胡增益. 1986. *Ewenkeyu jianzhi* 鄂溫克語簡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Evenki). Beijing 北京: Minzu chubanshe 民族出版社.

- HU, Zengyi 胡增益. 1994. *Xin manhan dacidian* 新滿漢大詞典(The New Manchu-Chinese Dictionary). Xinjiang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Xinjiang renmin chubanshe 新疆人民出版社
- LI, Shulan 李樹蘭, ZHONG qian 仲謙. 1986. *Xiboyu jianzhi* 錫伯語簡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Xibe). Beijing 北京: Minzu chubanshe 民族出版社.
- LIN, Lianyun 林連雲. 1985. *Salayu jianzhi* 撒拉語簡志 (A Brief Description of Salar). Beijing 北京: Minzu chubanshe 民族出版社.
- LIU, Jingxian 劉景憲, ZHAO Eping 趙阿平, ZHAO Jinchun 趙金純. 1997. *Manyu yanjiu tonglun* 滿語研究通論 (A General Study of Manchu). Heilongjiang 黑龍江省: Heilongjiang chaoxian minzu chubanshe 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
- SUN, Ming 孫明. 2010. *Kuanyu Hanyu Manyu liangci de bijiao yanjiu* 關於漢語滿語量詞的比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umer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 and Manchu). *Minzu fanyi* 民族翻譯 3.1 : 72-75 。
- UZHUER, Ounan 歐南·烏珠爾. 2004. *Dawoeryu kailun* 達斡爾語概論 (An Introduction to Daur). Heilongjiang 黑龍江省: Haerbin chubanshe 哈爾濱出版社.
- WANG, Qingfeng 王慶豐. 2005. *Manyu yanjiu* 滿語研究(A Study of Manchu). Beijing 北京: Minzu chubanshe 民族出版社.
- ZHAO NA SI TU, 照那斯圖. 1981. *Tuzuyu jianzhi* 土族語簡志(A Brief Description of Monguor). Beijing 北京: Minzu chubanshe 民族出版社.
- ZHAO, Xiangru 趙相如. 1985. *Weiwueryu jianzhi* 維吾爾語簡志(A Brief Description of Uyghur). Beijing 北京: Minzu chubanshe 民族出版社.
- ZHONG, Suchun 仲素純. 1982. *Dawoeryu jianzhi* 達斡爾語簡志(A Brief Description of Daur). Beijing 北京: Minzu chubanshe 民族出版社.